

@sia

L@bour
Upd@te

亞洲
勞動快訊

雙月刊

3

婦女專輯

Contents

社論

- 2 法律 規訓的實用藝術

婦女專題

- 4 性別與全球經濟 / Lourdes Beneria
9 全球化時代中 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 / 松井矢伊
13 女人 做個有意義的抉擇 / Mirmala Banerjee, Swasti Mitter
16 賦權? 還是另一種剝削的開端? / 佚名
23 古巴婦女解放運動 / Colette Harris
28 美國工運史中 有關性別與階級之探討 / Johnna Brenner

國際短波

- 32 國際運動短波 / 水水
33 工運團體選介-- 亞洲勞工教育中心

國內焦點

- 34 打了折又縮了水的失業保險 / 溫任遠
37 港台工運連線 / 陳奕齊
38 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 侯念祖
39 結構危機下的社會運動改革序曲 / 楊友仁
42 有關台北公娼事件的幾個想法 / 卡維波
48 新聞筆記

亞洲勞動快訊第三期

指導顧問: 蔡建仁 夏曉鵬
編輯委員: 陳奕齊 溫任遠 楊東麒
羅桂美 林哲淵 倪世傑
陸玲玲 許根魁 鄭怡雯
陳昆鴻 鄭敦仁
封面封底設計: 楊東麒

發行日期: 1999年3月
發行所: 亞太勞動快訊社
通訊處: 北市木柵郵政1之624號信箱
電子郵件: g6262005@grad.cc.nccu.edu.tw
印刷: 世新大學印刷中心
每本零售價: 新台幣50元整

法律

規訓的實用藝術

日前行政院在三八婦女節前夕提出「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後，催生此一法案的相關婦女團體，此刻她們批判的視野，將抗爭訴求侷限到——官方版與民間版條文內容的優劣、誰的福利好、法條內容要如何修的好。撇開手段策略面不說，其實，就法律存在的社會意義而言，它是國家機器透過各種規則來實現統治的實用藝術，因此，它的內容是命令性和技巧性的。

就以今年元旦開辦的勞工失業保險為例，官方就片面將給付條件之範圍限縮為，因「關廠歇業而失業」的勞工，而不是多數勞工的主觀認知的「失業」，只要是找不到工作，沒有生活收入，就是失業。官方更操弄法律文字遊戲，規範什麼是「自願」、「非自願」失業，但為什麼只規定關廠歇業，而且要符合一大堆附帶條件的勞工，才算是失業工人？此辦法實施兩個多月來，在官方統計數據將近三十萬名的失業工人中，真正領到這份「失業」保險的勞工不到三百人。這就是官方玩法的最佳例證。此等掛羊頭賣狗肉的「失業保險」，與失業保險的本意相

差了十萬八千里。這只是其中一例，光就相關勞動法制而言，這種背離立法原意的法令，就有無數個。

法律，只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們無法脫離社會的其他部份而單獨地信仰法律。若是社會運動者在面對弱勢團體時，只是一廂情願地運用社會工作者所謂的「同理心」，在面對「案主」困境時，只想到挖東牆補西牆式的運用社會資源，那個法條、法律有缺陷，就直觀地以正義之師的姿態，跳出來大聲疾呼要求修法、立法，並且信以為真的告訴案主（或是造成他/她們的幻/錯覺），法律就是你/妳們的救贖之道，這樣的認知對長期的社會改革而言是無益的。這還尚且不論國家機器的政府官僚，他們擅長說一套炫麗動人的主張，實際上操作卻又是另外一套。而運動者若不能突破將「法條鬥爭視為目的」的作法，那麼只要國家機器「好心」的順應民意立一個新法，號稱進步的運動者就反而變成鞏固這一套意識型態的幫凶，讓社會大眾在不知不覺中也習慣性的接受這一套行為模式。

法律，只是一系列政策手段中的一種措施，而且通常不能、也無法自己發揮作用。因此，絕對化地認為法律是直接影響社會變遷、改善社會的工具，這是個錯誤的認識。我們絕不是反對「在地行動」、「就地戰鬥」。「愛拼才會贏」，這句話不一定正確，愛拼其實不一定會贏。因為判斷力對結果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判斷力從何而來？當然，「全局思維，在地行動！」（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是必要條件之一。■



婦女專題



* 性別與全球經濟

* 全球化時代中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

* 女人,作個有意義的選擇

* 孟加拉婦女與 Grameen 銀行

* 社會主義國家 -- 古巴婦女解放運動

* 美國勞工史中有關性別與階級的探討

Gender and Global Economy

文 / Lourdes Beneria 編譯 / 鄭敦仁

性別與全球經濟

在最近幾年來，有關跨國際婦女經濟及社會地位的討論，逐漸地將焦點集中於國際化的經濟活動上。這些討論的內容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過程，包括工業生產中婦女就業的增加、跨國投資對婦女工作的影響、婦女在地下經濟部門的勞動參與、以及在債務危機降低了實質工資及生活條件的情況下，第三世界國家婦女家內勞動強度的增強上。不過，我們作的還不夠多，也不夠好。當我們在思索上述過程的影響時，我們更應該去思考如何將「性別」當作一個基本的思考中心，由此出發去構思政策及政治行動方案。

在這篇文章中，婦女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將會在一個全球的層次上進行討論。而如同學者 Nunez 和 Burbach 所強烈提

倡的，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超越傳統政黨政治的全民鬥爭，一個奠基於各種不同團體間緊密團結的國際化全民鬥爭。事實上，全球婦女所面臨的是一個千篇一律、傳統的政治體系。而左派身為體系中的一員，早已忽略、也不願意去觸碰這些性別相關議題。然而，如果政治及各式社會行動沒有嚴肅地將性別議題整合入它們的目標中的話，在各個國家及國際層次上運作的婦女運動，將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獨自奮鬥。由各種政治運動團結中所釋放出的力量將進一步減弱。

在試圖建立一個有效行動基礎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完成此目標所必須進行的分析工作仍極度缺乏。在國際層次上，特別是在學者 Boserup 於 1970 年出版了《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後，就一直有一種將第三世界國家性別相關議題，與工業化世界性別議題區分開來的趨勢。由此，學術圈內也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域，叫作「婦女與發展 (Women and Development)」。在這個領域內，理論的架構與隱藏的政治意涵非常分歧，其光譜可以由自由派一路排到左派。無論如何，將「(第三世界) 婦女與發展」視為一獨立課題的趨勢依舊十分盛行。而與此相呼應地，人們也趨於將「發展」單純地指涉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成長。

除了物化第三世界婦女的危險外，這種分離趨勢的真正問題在於：當經濟關係的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人們現在更需要由一個全球的觀點來思索婦女的角色。婦女在新國際分工所處

的位置究竟何在？我們能夠假設全球婦女的勞動參與正在提升之中嗎？當國際資本主義擴張之際，性別與階級是如何整合以面對變化中的經濟前景？到底什麼是全球化經濟所引發的最主要性別問題？這些問題的社會及政治重要性何在？在各國及不同區域的差異下，我們有可能得出一般化的普遍結論嗎？

這篇文章將致力於分析一些全球化的性別議題，並試圖探討這些議題在政治上的重要意涵。雖然我還未能對這篇文章所試圖分析的問題提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當我們試圖去了解全球變局的同時，將這些問題納入我們的考慮之中是很重要的。在此特別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在本篇文章的分析層次上，任何一種一般化論述都是非常危險的，它需要不斷地增添上各個國家的獨特經驗，以使其免於流於大而不當！

國際勞動力是否有女性化的趨勢？

對於國際勞動力是否有女性化趨勢這樣的一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首先，在概括的層次上，由於各區域、各國、以及各個產業部門的差異，使得我們幾乎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第二，對於這個問題，有幾股相反的趨勢在同時運作之中。對於這一點，我們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整理出它們的關係。第三，統計資訊仍然非常缺乏，而且，跨國的比較研究並不容易進行。此外，在統計上，我們還面臨一個更為特別的麻煩——「女性勞動的低估 (undercounting)」。如不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分析時將

可能會看到錯誤扭曲的圖像。

從「低估」這個問題入手，如果我們採用最寬廣的「勞動力」定義，即包含了自用衣食生產（subsistence production）及家庭勞動。那麼在國際層次上，勞動力是否有女性化的趨勢則顯的不那麼清晰可辨了。官方統計資料告訴我們說勞動力有女性化的趨勢，而那是因為生產自用消費及家庭勞動的人口（其包含了相當高比例的女性人口）在官方勞動統計中經常是被低估的。所以，如果官方統計顯示，許多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有提高的趨勢，這可能只是個錯誤的假象。這可能代表的是婦女由一些未被列入勞動統計的農業，以及以家戶為中心的生產活動轉移到比較正式且「可見」（visible）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統計數字的提昇不必然反映了勞動力的女性化趨勢。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婦女在非正式部門中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也不必然代表了勞動力有女性化的趨勢。

儘管有這些統計上的困擾，還是有不少資訊是我們可以確知的。首先，許多國家的資料顯示，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有提高的現象。在工業化國家中，此一趨勢在過去25年中是非常顯著的。拿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來說吧，在1980年代的時候，婦女勞動參與率就已突破了50%。這種成長的趨勢，甚至在愛爾蘭這種推行鼓勵男性就業政策的國家中也非常明顯。

但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則較難清楚地看出這個趨勢。根據ILO的資料，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在某些國家中有所增長，而在其他的國家中則否。並且在比較過不同的區域之後，也沒有能發展出一套清楚的模式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第三世界國家婦女就業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在1970至1980年代之間，就業提昇了50個百分點。不過，依照各國進行工業化的速度，婦女就業增長的幅度也有所不同。

在那些急速工業化的中等收入亞洲國家中，例如香港、南韓、以及新加坡，婦女就業的提昇也是在工業部門最為顯著。這個模式就與那些更為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不同。在西方國家中，增加的婦女就業主要是集中在服務業部門。

婦女佔勞動力比例的增加，其實反映了一個更為明顯的趨勢。這個趨勢在大多數的區域中都可以發現，即「工資勞動者的婦女化趨勢」。這個趨勢甚至在那些婦女佔勞動力比例低的國家也發生了。勞動力中的婦女是工資勞動者的比例，在那些急速工業化的亞洲國家，以及如埃及、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國，都有大幅的增長。在其他的非洲國家，由於大部分的婦女是在農業部門工作，所以還無法很清楚的看出這個模式。在拉丁美洲，儘管在大部分國家中，婦女成為工資勞動者的比例實際上都有相當程度增長，但官方統計數據卻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甚至在一些個案中還降低了）。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該區域工業化速度減緩所造成的。不過，這也很可能是因為大部份成為工資勞動者的婦女是非正式部門工作。

婦女成為工資勞動者比例的上升，首先，反映了全球層次上普羅化過程的進一步推展。其二，這反映了婦女在生產位置上的改變。此改變在一些特定的地區最為顯著，例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加工出口區（加工處口區在這些經濟體通常是代表了最為現代化的經濟部門）。不過，將這個動態置於一個較大的脈絡下是很重要的，絕大多數的第三世

界國家婦女仍是在農業部門中工作。在亞洲、非洲、及中東，勞動力中百分之七十的婦女是在農業部門中工作。至於拉丁美洲則是個特例，拉丁美洲婦女多數就業於服務業部門，相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其模式更趨近於那些較為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這反映了拉丁美洲男性集中於農業部門的傳統，不過，這也很可能是因為許多身處於農業部門中的婦女根本未被列入統計之中。

國際化的性別議題

在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全球化影響下，產生了許多不同形式、強度的性別議題。本文這一部份將由婦女工作的角度來分析一些性別相關議題，簡單地介紹一些正在發展的過程。不過還是提醒讀者，即本文接下來所進行的分析當然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國際化性別議題。

多國籍企業與婦女

在近來有關新國際分工的文獻中，有很大一部份的論述焦點是集中在婦女受僱於多國籍企業上。這類的文獻主要關注焦點是第三世界國家，文中尤其強調大量婦女集中於如加工出口區、美墨邊界等外資集中地區的現象，以及種種婦女在工作中所遭遇的剝削的、不穩定的工作環境。

雖然這些文章相當具有啟發性，不過如果檢視真正直接受跨國資本僱用的婦女人數的話，我們會發現這些文獻時常流於過分誇大了跨國資本僱用的重要性。雖然對此我們仍然需要更多的資訊

編按：

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其必與階級脫不了干係。是故，在全球經濟襲捲五大洲三大洋的今日，如欲評估女性地位之變化，及處理女性所面臨的種種難題，必得整合階級與性別面向，以全球性的視界來設計行動方案。而此亦為本文作者 Lourdes Beneria 所殷切期盼於吾輩者。

，不過，就目前可得的數據顯示，直接受跨國資本僱用的第三世界國家婦女人數還不到20萬人。20萬人這個數字還不到第三世界國家女性勞動力人口中的百分之一。換另一個角度說，20萬人相當於多國籍公司全球僱用人數的百分之三。

儘管如此，這類主題在文獻中所佔的份量如此之重依然有其原因。雖然每個國家的情形各有不同，但是在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或是一些如加工出口區的地方，多國籍企業的投資及其對婦女的僱用確實是很重要的。另外，我們還應該考慮多國籍企業僱用婦女的間接效果。多國籍企業會透過外包體系的運作，與大小規模的國內企業產生聯繫，從而在僱用上產生乘數效應。一項在1981至82年間針對墨西哥城外包企業所進行的研究顯示，絕大多數受調查的企業其僱用的婦女人數都有增加的現象，而且，越是在外包階層中處於底層的企業，其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也越高。

另外一項多國籍資本所產生的間接效應為僱傭趨勢的建立。由於多國籍企業僱用了許多婦女，當地企業也逐漸「發現」了、或「接受」婦女成為企業勞動力的成員。此外，多國籍企業的僱傭經常會透過激發消費主義而產生消費上的效果。因為多國籍企業支付員工較高的工資，此外還將當地工人整合入國際消費市場中。

由於以上原因，再加上多國籍企業是當今全球經濟動態中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絕不應該低估其對婦女經濟環境的影響。只不過，其影響應該以一個更為適當的角度來觀察：畢竟，大部分的婦女並不是受跨國公司直接僱用，而是身處於農業、或是勞動力市場中一些低薪的部門。

婦女受僱於勞力密集產業的新現象，使我們不能再如學者Boserup於1960年代那樣地斷言：「當較大規模的企業逐漸地將當地企業排擠出市場之後，婦女

將會失去她們的工作、、、、」在作此聲稱的同時，Boserup也強調了婦女將逐漸成為自僱者，且集中於以家庭為基地的產業之中。她之所以認為會有這樣的趨勢，是根據其所謂「雇主對男工有偏好」的說法。同樣地，她也點出了婦女就業時所面臨的歧視，例如「擔心婦女暴露於工廠環境中去道德化的影響下」。雖然許多這類的性別歧視在20年後仍然沒有消失，不過一些重大的改變確然已經發生。我們可以看到，現今社會已較為接受女性成為工資勞動力中的一員，而且在許多工業生產中，雇主在僱用工人上的性別偏好已經由男性轉變為女性。

這種性別偏好的轉變，在勞力密集、使用廉價勞力、並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中非常的普遍。眾所週知，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加工出口區，其婦女佔勞動力的比例可以高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譜。

婦女的工作與薪資

婦女薪資較低的情況在各國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雖然性別的薪資差距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性別歧視，而且男女薪資差距在各國都呈現出不同的樣態；不過，立基於性別差異的薪資歧視卻是全球皆然的。在某些國家中，同工同酬的政策至少在原則上有可能被採納，不過，公開的薪資歧視卻在其他的國度中推行如故。

然而，婦女低薪資的最普遍原因依然是勞動力市場中對於低薪女性工作與高薪男性工作的區隔。這樣的區隔在各國都可以發現。不過，一份工作是「男性的」或「女性的」在各國都有所不同。Boserup在研究過農業的勞動過程後便強調，性別分工並不是自然的產物。儘管如此，女性的職業都是較為低薪的這點事實可以說是舉世皆然，同時，一份原是男性的職業一旦「女性化」了之後，其相對薪資即有下跌的趨勢

。勞動力市場區隔不只牽涉到性別，其同時也與種族、少數民族等因素有關。生產活動的全球化增加了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的複雜度。資本將有可能在全球層次上，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區隔並從中獲利。不過這個研究領域仍然有待發展。

儘管一些指標顯示勞動力市場區隔在最近幾年，於某些工業化國家中有些微的減少趨勢。但就全球整體而言，勞動力市場區隔的程度仍然相當的高。這個可在不同經濟與政治環境中察覺到的全球性現象告訴我們：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區隔不只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物，而其不易破除的僵固性也可能繼續成為不同經濟體制下性別分化的根源。不過，在全球層次上我們卻幾乎未見有什麼有效的措施可以來處理這種情勢。「同值同酬comparable worth policy」的政策僅在一小撮國家中受到討論，並在為數更少的國家中以支離破碎的形式予以推動。由於大多數國家中的男女從事不同工作，因此推動同工同酬法案具有相當的難度。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發展出的同值同酬概念，實際上在許多國家中根本沒有人知道。此外，執行同值同酬政策的困難度，以及企業與保守份子的反對聲浪，都使我們無法對未來抱有太樂觀的看法。更糟的是，持續不斷的勞動階層重組，亦會摧毀人們推動同值同酬政策的努力。

儘管前景不甚樂觀，但是在歧視行為、勞動力市場區隔等議題帶上了國際面向後，人們更應該不斷地指出其嚴重的負面影響。全球規模的大量婦女勞動儲備，是資本用來解決國際競爭壓力、利潤下降危機與經濟重組的工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利用了大量的廉價婦女勞力，方由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經濟。

之前，我們談過了僱傭偏好的轉移與婦女低工資的狀況，許多研究指出，對婦女僱傭的偏好其

原因不僅是因為價廉而已。僱傭偏好的原因大致可被歸類為以下三類。第一，不論這些「性別特質」是真或假，出於某些原因，女工被認為是易於進行勞動控制的對象。這些原因包括了女性較願意服從命令、較有紀律性等等認為女性是「溫馴的」性別刻板印象。第二，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僱用婦女是因為生產力的因素；很多報導告訴我們，女性在處理小型物件時表現較佳。這類理由可以將之稱作「靈巧手指的論述」。在某些情況中，例如在成衣生產中可以見到的那樣，這代表了人們認可並使用了女性經由性別社會化及其工作經驗中所習得的技巧。第三，由於婦女大量集中於臨時性、兼職工作等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之中，所以她們也代表了一項重要的彈性化勞力來源。透由此等彈性化勞動力，勞動力供給可以作最大程度的調節以呼應勞動力需求的變化。這種勞動力調節的重要性，對於邊緣的、非正式的勞動過程而言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不過，如同我們在當今工業化國家進行經濟重整時所見到的，同樣的過程也可以在較為正式的工作型態中發現。

賣春與性觀光

全球經濟下另一個比較不同的性別議題即為性觀光（sex-related tourism）的擴張。性旅遊這個現象，在過去數十年來於某些國家中（如南韓、泰國與菲律賓）有驚人的成長。性觀光的擴張，首先，代表了國際觀光產業和賣春在全球層次上的連結。其次，不論是性觀光或是賣春，都是受資本的國際化所進一步激發。資本的國際化使得國際交通與貿易更為便捷，並擴大了國際商務管理階層（他們也就是性觀光與賣春的主要顧客）。第三，在上述的東南亞國家中，賣春的現象，常常與軍事活動或軍事基地有所關聯。第四，雖然賣春是個古老的產業，不過今日真正與過去

不同的是：其氾濫的程度及經濟上的重要性。作為外匯的來源與國際商業往來的潤滑劑，企業與政府的利益在賣春這點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在之前提到的許多國家中，政府都非常主動地透過推動觀光業、核發執照、國際廣告等方式來促進性相關產業的發展。

根據人們的估計，這類產業的規模都相當的龐大。於1979年，菲律賓一共有100,000名「陪侍女子」（hospitality girls），她們都擁有由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所核發的執照與健康證明。在1977年，光是曼谷一地就估計有100,000名妓女與200,000名按摩女郎。1981年時，泰國全境就大約有500,000到700,000名妓女。南韓根據估計也有相當多數量的妓女存在。在這些國家中，付給妓女的夜渡資與性相關產業的花費都比在先進國家便宜。當然，這並不是說賣春這個現象只是個單純的相對成本問題。今日的賣春問題實際上是種族、性別、階級與文化差異等種種問題的交會點，讓我們看出此等因素相互影響所模塑的宰制關係的複雜性。正如同一位在菲律賓某小島上工作的女孩所說的：「、、、當旅客開始湧入小島之後，沙灘上處處可見性致勃勃的男子與棕膚女孩進行交易、、、而如果妳問那些藍眼睛的男子為何來這兒，他們會告訴你說，因為這裡的女孩會用最女人的方式將他們伺候的如天堂中的國王一般。」

如果我們繼續探究這些女孩出身何處？那麼我們會發現，這批女孩都是由泰國北部地區、菲律賓貧民窟等最貧窮的區域與家庭中流落出來的。這個現象實在是全球經濟下，國際噴射觀光的快感與生存的苦痛兩者間交會的最佳寫照！

經濟危機與婦女的工作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外債加身，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推行了

緊縮政策。本文所要談的最後一個全球經濟下的性別議題，即為家戶在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時，婦女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來已有許多對拉丁美洲及非洲的研究指出，外債危機對家戶進行預算開銷時造成了多大的負面影響。這些研究也告訴了我們家戶如何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下存活下來。例如，學者Cornia就詳細地描述了家戶開源節流的種種方法。面對惡化的經濟環境，家戶的應對之道從購物習慣、食物準備、消費模式的改變，一直到讓新的家庭成員出外賺錢、增加自用消費的生產、移民、與依靠大家庭的奧援等等，不一而足。

不過，在Cornia的分析中，卻沒有提到婦女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儘管如此，上述這些應對之道的性質，與新研究中的證據都顯示，婦女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扮演著一個頗為吃重的角色。食物生產、購物、組織家內大小事務本來就是婦女日常責任的一部份。同樣地，若是要使其他的家庭成員出外賺取薪資，最可能被挑選到的對象也是婦女與小孩（這群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本來就相對較低）。

這些過程如何與全球經濟扣連起來是非常明顯的。大量的外債，作為從第三世界國家所吸取出來的最後剩餘價值形式；及外債與國際金融、貿易、投資模式的關聯，都指出了一個事實：舉例來說，玻利維亞一名礦工的妻子，其日常生活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都是當今任何全球經濟討論中的一部份。當各國的婦女漸漸了解這些機制是如何運作的之後，她們日常生活中的鬥爭，就躍登上了全球的層次。

評估改變與行動

究竟對婦女而言，越來越涉入全球經濟是否代表了一項正面的改變？在相互矛盾因素的同時作用下，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在這個主題上的種種爭辯，

事實上都部分導因於各國間的差異；而這個問題，在研究者未注意到每個國家特殊性的情況下，也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在概括的層次上，有人認為，對工作婦女整體來說，現今國際經濟的新興潮流反映了婦女經濟地位的絕對向上（尤其是對在工業部門的婦女）。然而，在婦女在再生產及家戶工作上仍肩負主要責任的情況下，任何企圖對整體狀況做一評估的研究者都應該將此一面向納入考慮之中。

這代表了在分析此問題時，至少應區分為兩個層次進行：其一聚焦於性別與勞動力市場間的關係；其二則將焦點置於家戶與家庭關係上。所以，「被吸納於全球經濟之中對婦女而言是否是一正面的改變？」這個問題的另一提法即為：「在全球變遷的影響下，性別是否被解組了？」在此，同樣的，所謂的改變並不是單面向的。與某些國家中與勞動力女性化趨勢相伴的，是婦女越來越高的經濟自主權與越來越多可資選擇的工作。這個情況在某些國家中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相信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婦女身上。

婦女有越來越多的工作可資選擇，及其擁有越來越高經濟自主權的現象是相當明顯的。不過，新的性別重組形式，以及隨之而來對於女性工作者的歧視待遇（特別是不穩定的就業環境）都還沒有消失。不穩定的就業環境、工作機會的流失，對年輕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面對這種狀況，經濟學人周刊對於年輕失業女性的下場提出了這樣的一個疑問：「難道情況真的會像那些犬儒者所說的，貌美的女孩成為吧女，相貌平庸者則投身回教嗎？」（*The Economist*, Jan. 31, 1987）這段話中所隱含的性別歧視告所我們，還有很多性別刻板印象有待我們去打破。它同時也告訴了我們，那些被視為是性別平等正面改變，其事實上有何麼脆弱。

儘管同時出現了此種型態的倒

退趨勢，在大部分的國家中，人們對於婦女成為工資工人的接受程度都有明顯的增長。婦女就業的增長與越來越多的工作選擇機會，代表了性別刻板印象的碎裂及更高度的兩性平等。不過在此同時，一些如低薪與惡劣工作環境等不平等的型態仍然同時存在。而且，新的不平等形式仍然有可能隨時出現。

在家戶層次上，有一些指標顯示新的性別分工形式出現了。在高收入國家中，婦女花在家務上的時間較諸以往已有所減少，男女在分擔家務上也更為平等。不過，這項改變仍然不甚明顯，而其最多也不過影響極為少數的一部分人口。

儘管在作一般化論述時需十分謹慎，但在國際層次上，工作婦女的雙重負擔（工作、家庭）看來也仍然是個全球的普遍現象。然而，雖然難以捉摸且尚待更多研究，改變可能發生了。例如，學者 Safa 就這樣說道：「婦女在家庭收入上越來越高的經濟能力，有可能挑戰傳統的父權權威，並創造出一個更為平權的家庭結構。」

摘要地說，經濟的全球化顯現了許多相互抵觸的性別面向。一方面，勞動力的女性化代表了婦女在賺取家庭收入能力上的提昇，而這有可能為婦女帶來更多的自主權、性別解組與更為平等的兩性關係。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改變是立基於之前的不平等之上。而正因為這些不平等有助於當今全球經濟的運行，其也可能不斷地延續下去。此外，性別不平等持續地與婦女的「性」（sexuality）與再生產的角色扣連在一起，這意指了除非我們將此一面向整合入我們的分析之中並據以尋求解決之道，否則性別不平等將不斷地持續下去。

在面對這些不斷發展的情況時，究竟什麼是可能的實務應對之道？首先，有些性別議題，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透過傳統的進步政略管道來試圖解決的：例如，

將婦女的利益統合入工會組織之中，推動最低工資、與國家就健檢與生育權利進行協商、有關產假的政策、有關各國對婦女最優待遇的資訊、托育及工作環境等影響婦女最深的事項。如同上文已提及的，同工同酬的立法工作仍然需要繼續推動與執行（在某些國家內則需要引進此一觀念），並在同值同酬的信念上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與行動。進步性工會與政黨引導疏通此類行動的能力，端視其處理此類性別議題的意願。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那麼解決途徑只好透由獨立的婦女組織來完成。

除此之外，其實還有許多性別議題更難以被整合入傳統的進步政略之中，其原因出自左派的無意願、或者是這些議題並不被他們認為是重要的事項。然而，尤為重要的正是這些不被認為與階級政治有清楚關連的各式議題，左派在面對此種情況時的無能是惡名昭彰的。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毫不驚訝的發現，那些最能積極面對國際賣春問題的行動，都是由女性主義者的網絡所發起的；然而，這些女性主義者並不傾向對國際賣春與階級出身間的關係提出質問。一但此兩者之間的連結出現，這對那些不願整合性別與階級議題的左派和女性主義者都是個很大的損失。

其他尚有待整合階級與性別的新興全球化議題還包括了：由窮國輸出家庭幫傭到富國工作的現象、以及建立在性別、階級與國族上的剝削環境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幾乎都還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但是這些問題對我們而言，正是個鮮明的範例，呼應了本文開頭 Nunez 與 Burbach 所呼籲的那種對新政略的企求。對於婦女來說，只有在各個團體將性別議題視為是自己所扮演的中心角色時，團體之間的團結才會具有正面的助益。■（本文出處：《*I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

全球化時代中

文 / 松井矢依

編譯 / 林哲淵

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 (譯注1)



編按：

有別於商品與資本的流動，勞動力的流動也是當今全球經濟得以順利運行的要素之一。本文作者松井矢依為日本女性資源中心主任，其以性別的角度切入，替我們簡要的剖析了女性移工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女性移工的急遽增長

離開他（她）們所居住國家的移工及其家屬，在各種國際組織的估計下有八千萬人；這數量大過人類史上的任何一次。

最近世界移民的趨勢之一即是始自 80 年代增長的「移民的女性化」，在亞洲地區，這現象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根據 ILO 的報告顯示，每年有約八十萬的亞洲女性離開她們的國家到國外工作。

以菲律賓這個最大的移工輸出國為例，1993 年離開國內的移工中有 55% 為女性，1994 年時比例增至 60%。在一些如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國家中，有 90% 的契約勞工為女性，在歐洲的四十萬菲律賓人中，也有 90% 是女性；即便是具有男性支配歷史傳統的沙烏地阿拉伯國家，1992 年在合法的移工中，有 55%

是女性。

然而，在移民女性化的潮流中，菲律賓並非是排名最前的國家。在斯里蘭卡，離開國家的合法移工有 84% 是女性；在印尼，1988 年至 1993 年女性所佔比例則從 66% 攀升至 77%。

大部份的移民女性從事家務幫傭或表演服務者

國際移民勞工的女性化，不僅意謂著女性勞工離開她們國家的數量增加，我們還得去注意她們在國外所從事的工作類型。大多數的移民女性從事家務工作或是表演服務者（entertainer），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移民成為外籍新娘。

在香港，85% 的女性移工被雇為家務幫傭；這其中估計近十萬的菲律賓人是最多的，其餘則來自印尼、泰國、印度、和斯里蘭卡，各有數千人。

在新加坡，約有七萬的外籍家庭幫傭被雇用；其中菲律賓人最多，另有相當數量來自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及其它國家的女性，也從事同樣工作。而一些泰國女性則在妓院被發現，她們常會被逮捕後遣送回國。

在其它如韓國、臺灣等輸入國，菲律賓及泰國女性都只從事家庭幫傭和表演服務者。

馬來西亞以三百萬的移工人

口成為亞洲最大的輸入國，這包含了合法以及非法的移工。至於她（他）們的來源，其中的一半，也就是一百五十萬是印尼人，有一百萬來自孟加拉。關於性別比例的部分，有 40% 為女性，她們投身於工廠、農場，以及娛樂產業。

日本所輸入女性移工只擔任表演服務者及新娘的奇特處

基於維持日本同質性社會的迷思，日本官方移民政策在除了受訓者之外，在禁止非技術勞工進入方面仍是十分嚴格；即使勞工短缺，特別是在俗稱的 3D 工作區（dirty 骯髒，dangerous 危險，difficult 難度高），已促成自 1980 年代引進非技術工人成非法移工。

然而，日本政府卻已准許年輕女性，持表演服務者的簽證合法進入。大部份這樣的表演服務者是菲律賓女性。實際上，這些持表演服務者簽證進入日本的女性，有的從事歌手、舞者等工作，也有的成為老闆娘、女侍者、或是娼妓。根據移民統計資料顯示，持表演服務者簽證進入日本的菲律賓人多為女性，在 1991 年至 1994 年的高峰期間，每年有超過五萬名，近幾年也有兩萬人上下。

與最近持表演服務者簽證進

入的菲律賓人減少的情況比起來，另一個重要趨勢則是持結婚簽證進入日本的菲律賓女性大幅增加。持結婚簽證的菲律賓人的數量，在1996年超過五千人，在1997年可能已超過六千人。異國通婚，以往多是發生在日韓兩國之間多，不過從1996年開始，這個趨勢已被日菲通婚所取代，除此之外，未在日本辦理婚姻登記的日菲配偶也有增加。

因此，日本目前面臨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就是日菲混血兒（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 JFC）被日本父親棄養數量的急遽增加。這些懷了日本男人後代的菲籍移民女性，通常是持用六個月的簽證，所以必需回菲律賓生產。在一開始，他們的日本父親會探望或寄錢給他們，或是至少打個電話、寄信給他們，但是在一段時間後，通常會發生父親離棄他們的情事，於是，數以千計的日菲混血兒就這麼同父親斷了聯繫。根據成立於1994年的JFC公民網路表示，JFC家庭將遭遇各種的難題：母親需承受心理上的沮喪及經濟上的困境、JFC遭遇自身的認同危機，以及忍受失去父親的感覺。

這些由日籍男性與菲律賓或其它亞洲國家女性所生的小孩在日本正在增加之中，他們之中有許多並無國籍，因為他們的母親大多是逾期滯留，她們擔心被移民單位知悉，所以並為孩子未登記戶口。

保護移民第二代的人權的問題，在輸入國來說成爲非常重要的任務，但是常被忽略。

在亞洲對女性而言，人口販

賣成了虐待女性移民的形式，正不斷擴大

日本是世界上女性人口販賣的最大輸入國，每年有數千個泰國女性，被人蛇集團販賣至日本，當成性奴隸來虐待。她們之中有許多是來自泰北，尤其是赤貧的山地部落地區；當她們抵達日本，立即被賣到妓院之中，並且被要求以賣淫來償還和她們完全無關的四千萬日圓（三萬美



金)的債務。這意謂著她們以這個價錢被當成商品買賣，並且因爲完全無法清償，而被迫賣淫。

在1996年，其中約有三千個泰籍女性從這樣的奴役狀態中逃離，但是她們大多數必須處在如此不堪的情境中。泰籍女性謀殺雇主或妓院老闆的悲劇案例，在1990年代初期一而再地發生。例如在發生於1991年的下伊達(Shimodate)事件中，三名泰籍女性試圖逃脫並殺害她們的泰籍女雇主，她們拿走雇主的皮包，以爲她們的護照放在裡面，卻只發現她們顧客所給付，作爲性服

務報酬的七百萬日幣現金，在她們被逮補後，警方筆錄記載爲一宗「蓄意強盜謀殺」的案件，因爲她們是貧窮的泰裔日人，而她們也無法說明其並非謀財害命。

不論如何，這個令人感到驚恐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泰國女性通常是如何地被泰、日兩方的人口販賣者當成性奴隸來剝削，爲淫媒及其它的代理者創造巨大的利潤。這只販賣人口受難者不可計數的苦難與痛苦的冰山一角。

泰國女性不僅被賣至日本，也被賣至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其它國家去進行性剝削，即使這數量是小於日本的。

不僅是泰國女性在交易下被犧牲，四萬至五萬的緬甸女性被賣到泰國，她們之中有許多感染了HIV，而被丟棄在泰緬邊界的城鎮。來自南中國雲南省年輕的少數民族女孩、柬埔寨及寮國的女性也都是泰國貿易商的目標。

除了泰國是東南亞的交易中心之外，印度是另一個南亞的中心，二十萬的尼泊爾女性被賣到孟買或印度的其它城市成爲廉價娼妓。根據尼泊爾反人口交易及愛滋運動的女性團體的報告，尼泊爾女性在印度妓院的情況如同身處地獄，她們之中有許多感染HIV並且早夭。

至此，對女性以及兒童的國際交易被視爲是奴役的現代形式，一個在亞洲最嚴重，迫切需要解決的人權議題。

在輸入國家針對女性移工的暴力增加

實際上，在雇主國家的女性移工是最被虐待、剝削、壓迫、奴役、離棄及侵擾的範圍；在亞洲許多雇主國家，不僅是交易的犧牲者，也有許多家務工作者也面臨性暴力。一個眾所皆知的例子是莎拉·貝拉柏根（Sarah Balabagan），她是摩洛族裔的菲律賓女性，在十五歲時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當家務幫傭，1995年她殺了強暴她的雇主並且被判處死刑。這個如此年輕的女孩，她的惡劣情勢的消息震驚世界；這個營救她的行動擴及全球，最後她終於能重返家園。

然而，一個在約旦的二十四歲家務工作者艾麗莎·沙勒姆（Elisa Salem），卻無法活著回家，據報導1996年她死於脾臟壞死所造成的出血。根據約旦方面法院的裁定，她是在試圖脫逃的時候，從雇主所居住建築物的四樓墜樓，然而，家屬懷疑可能是被毆打致死。

事實上，現在已有愈來愈多關於年輕女性移工的困境的報導，她們在性暴力、虐待、羞辱以及其它形式的困境中被犧牲了。某些移工必須帶精神的痛苦、心理傷害回到母國，最糟的例子還有死亡的。

根據菲律賓海外福利管理部門的負責人表示，每個月平均有六十具移工的屍體被送回國內，在1996年1月至8月十四個菲籍女性移居者離奇死亡事件的報告中，包含了四個自殺案例，其中三例來自新加坡。

在大多數亞洲的父權國家中，女性並不被認為擁有平等的公民權，因此，女性移工遭遇更糟的對待。此外，針對移民女性的犯罪是私下且隱匿的，尤其是在性暴力的方面，在文化傳統的影響下，被侵害的女性多半不敢說出她們的遭遇。

在對女性移工暴力事件一再發生的情況下，聯合國的組織最

近通過了一項特別決議，要求所有的國家採取防範措施，以保障移民女性的人權。這決議一是在1998年3月由紐約的女性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f Status of Women）通過，另一則在1998年4月由日內瓦的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所通過。

對移民女工進行教育是刻不容緩的，此外，我們還需要在如何抱怨、披露、紀錄、監視、組織陣線、政治化、和達成「侵犯」仲裁等方面支援她們。如果有必要的話，可利用聯合國代表大會、檔案，或國際、國內法令，以及訂立新法令，在克服文化障礙的陽光下，開始坦白地討論隱藏地針對移民女性的犯罪，是非常重要的。

國際女性移居者的性別向度：再生產與性勞動

絕大多數的女性移居者進入家務勞動、娛樂業或婚姻（郵購新娘）之中的現象，可被視為從低收入國家與較高收入國家間再生產勞動的國際移轉。

輸出國推動女性勞動出口政策，去賺取外匯償還外債的方法，正好符應了輸入國對再生產勞動需求的增加，女性被雙方當成工具利用。

在經濟低度開發、貧窮且持續失業的輸出國裡，女性也必須成為家計的承擔者，到海外去謀生。

在如日本以及亞洲新興工業國家（NICS）的輸入國裡，投入勞動就業市場的女性人數增加，但是，在家中勞動的性別分野並未改變，而且，由於全球化的原因，大多數的國家傾向於將照料小孩及老人的國家援助刪減或私領域化，於是上班族女性必需依賴外籍家務幫傭，這在已開發國家和亞洲新興工業國家中，都是

個普遍的現象。

但是在日本的例子裡，首先，除了放棄國籍的家庭之外，政府政策並不允許移民女性從事家務幫傭，而且，一般的日本家庭並沒有雇請家務幫傭的風俗。

然而日本政府已同意，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發出娛樂表演者的簽證給菲律賓女性，讓她們進入缺乏年輕女性的性產業中工作；而且，政府也鼓勵難娶到日本女性的日本男人與其它亞洲女性通婚，因此，菲律賓、泰國、韓國以及臺灣的女性，通過各地政府或私人婚姻仲介的安排，被帶至日本。

這些亞洲新娘被期望能生小孩、照顧年邁雙親、而且能從事農作，或是能在臨近的工廠或商店賺取額外收入，亞洲新娘也因此能被稱為是國外再生產勞動的一部份。

另一個也應該充滿移民女性的區域，則是提供給在城市中工作男人的娛樂業。以「企業戰士」之稱聞名的日本男性，他們的工作時間遠超過西方國家的男性，競爭的工作環境使他們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因此，他們需要包含性服務的娛樂業，做為他們工作緊繃之餘的補償或排泄口。這是一個用以解釋「性產業」遍及全國，以及在這當中日本年輕女性的短缺，必需以輸入外籍表演服務者來解決的理由。

日本有獨特的娼妓及性交易的傳統，影響了目前對性慾及娼妓的看法及態度。從十七世紀初期，被稱為「廓」（Kuruwa，妓院）的政府公認的娼妓團體制度，一直繁昌至1956年娼妓保護法設立才被正式廢止，但是今日性產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擴張。

在性方面對女性的國際貿易，早在十九世紀晚期便已展開，當時這些被稱為「唐行」（Karayuki-san，譯注2）的日本貧窮女孩，被強迫送到東南亞及東

亞，甚至遠至非洲的妓院工作。然後，從1930年代到二戰結束，約有二十萬被日本殖民的韓國女孩，以及被日本軍隊佔領的其它亞洲國家的女孩，被強迫做「慰安婦」(Comfort Women)，為日本男性軍人提供如性奴隸的服務。自1970年代起，菲律賓、泰國及其它亞洲女性也已經開始被賣至日本。

顯然地，要分析在亞洲女性移動的各種情況，只調察經濟因素是不夠的；追溯歷史背景、社會狀況，尤其是每個社會中性別關係以及性別的意識型態，也是非常地重要。

全球化促成移民者的女性化及為獲得聯合國大會承認的全球運動

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是由北半球的龍頭國家透過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及跨國公司(TNCs)等的國際機構所促成，這意謂著市場競爭已到熱白熱化的階段。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為了在全球競爭中獲勝，更廉價的勞工、更差的工作環境以及更少的社會救濟是必需的。龐大數量的全球流動金融資本，會在轉眼間將一國的經濟破壞殆盡，如同去年一些亞洲國家一般；貿易及投資的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結構調適造成巨大的失業率；消費主義被擴展，任何包含了人的事物為求利益都能被商品化。

全球化在亞洲國家造成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由於這些國家失業的大幅增加，它們的政府現正嘗試排除外籍移工；同時，在已開發國家中升高的右翼勢力也將她(他)們視為代罪羔羊加以攻擊和迫害。

在具破壞性的全球勢力及經濟危機中，女性是最容易受到傷

害的。她們總是被當成追求利潤的工具，更多在南半球的弱勢經濟地位國家的女性，仍然被迫離開她們的國家，到世界各地成為移工或新娘，並且面對更嚴重的虐待。

然而，保護移民女性人權的戰略，應當在以下兩個陣線上繼續：在抵抗地域性經濟及社會文化的制約方面，以及對抗市場經濟全球化的部份。

全球化的團結應當被建立並鞏固以對抗全球化，其中之一的行動就是加入「要國際委員會對保護移工及其家屬權利加以承認的全球運動」(the Global Campaign for Rat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1990)。這個委員會有一些重點訴求，其中之一是為包含合法、非法所有移工，以及他(她)們的家屬拓展基本人權，使合法的移工及其家屬的額外權利被承認，例如在職務上所屬國家獲得平等的對待。這個運動是有必要的，因為只有十個國家承認他們的權利，為了讓它付諸實施，即使是必須要有二十個國家去承認它也得要進行。我們必須基於以下這個原則去掌握各種運動：移民者的權利應被視為人權。■(本文出處：《Probleming Asia》論文集上冊，1998 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亞太文化研討會)

譯注 1：女性化(Feminization)在本文脈絡中具有雙重意涵，其一是指國際移民中，女性所佔比例增長的趨勢；其二則指涉國際移民者所從事的工作，為普遍被認為具有陰性特質，例如家務勞動、娼妓，甚至是出售子宮的新娘。這是在傳統

公私領域分野及性/別服務的層面上，被父權體制所定義的「陰性勞動」。這雙重陰性的增長，在此使移民潮有女性化的趨勢。

譯注 2：專指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從日本西部地方(特別是天草島、島原半島)，由賣春業者經手而流至海外，成為賣春婦的女性的總稱。這不包含中日甲午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以「女子挺身隊」為名，被迫動員至前線的慰安婦。

女人作個有意義的抉擇

科技與新經濟秩序

文 /Nirmala Banerjee Swasti Mitter

編譯 / 陸玲玲

編按：

科技變革是當前解釋社會變遷成因的重要變項，然而其與性別間的關係，卻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探索。透過本文初步引介，或許可以增進吾人對性別不平等社會中。科技與性別互動態勢的理解。抑或者，讀者亦可將本文當做一個起點，進一步去深究當今科學技術，是否本身即內含性別歧視的性質於其中？

這篇文章主要發表兩個相關的議題 -- 印度職業婦女對科技變革及全球化的回應，以及這些變革對於婦女工作的衝擊。作者以數個不同背景的婦女們為試驗的例子，並以不同地區、工業和科技改變作交互試驗。這項分析顯示儘管有許多差異，但婦女成為科技變革下最大受害者的理由是驚人地相似。此外，在二手資料中，作者也利用非政府組織(NGOs)從事田野調查的大量經驗文獻資料。

I 簡介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討論兩個當代的議題。第一是關於印度職業婦女對科技變革及全球化的回應；第二是關於這些變革對印度婦女工作的衝擊。這兩個議題是相關的，印度婦女的回應是基於過去對經濟秩序中意外變動的正負經驗。

二手資料的出版品是由非政府組織近來從事組織職業女性的田野調查文獻資料而來。從1994年至1996年新式科技聯合大學研究機構(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 UNU/INTECH,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受委託，從8個亞洲國家中篩選非政府組織作研究。本文焦點為印度職業婦女在科技改變中的要求、關切及抱負。

在印度，這些科技和婦女生活的互動是深受社會及文化價值影響，並且還受到工作類型的影響。我們因此將近來所收集到的資料，放在鉅視的歷史脈絡下進行了解，為何婦女對於科技的變革都是以負面的結果收場？這項認知對於非政府組織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及政策決定者的行動有著重要意涵，並使科技在印度婦女的生活及工作中能成正面改變的先鋒者。

婦女要能在科技變革的辯論中發言，而在宣揚全球化市場中要有競爭力的同時，就是推動國家成為科技化烏托邦的出發點。這個結果通常是負面的，反而激起印度婦女運動排斥接受科技發展。這些分析雖引起政治及哲學上的討論，但對於許多急迫地危害婦女的問題卻沒有解答。他們也無長遠的對策或可供選擇的計畫。因此，如何看待科技對於婦女生活和工作的侵害，在運動中有相當多的矛盾。這些資料也併入下列非政府組織所提出的資料中，資料內容則提出了這個概念的空白之處。

為何是科技？

目前為止，在印度關於科技變革衝擊的議題，常被包含在性別及發展的辯論中。根據Boserup的分析，資本主義擴大發展常會迫使女性在經濟上被迫邊緣化。只有少數研究者負責任地調查、分析不同社會文化和經濟反對婦女的偏見因素。而當今潮流是責難現代科技原本就是排擠婦女。這個觀點沒有任何助益；有些變革是明顯有利於婦女，而有許多的變革則是婦女所期盼的。研究顯示，稍後在本文會提到，在科

技決定的控制過程中，事實上有給予婦女權力影響有關她們自身發展的決策。在這個脈絡下 UNU/INTECH 的方案，要去拓展的不只是科技變革能做什麼，而且還要指明這些決策背後的風險承擔者——在過程中潛在的獲利者及受害者以及他們相關的權力來源。

II 一道藍領閃電：紡織業

印度的棉花紡織業提供了一個分析科技及性別關係之間交互作用的例子，尤其是當女性工人面臨幾個歷史上的關鍵問題時。Action India 研究在德里 (Delhi)，非政府組織人員與當地手工織布的女性織工一起工作的案例，至少記錄兩個以上的例子。婦女的工作同樣地因科技變革而被毀。我們調查這個三個案例並試圖找尋這些事件的共同解釋。

在幾世紀前，孟加拉的棉花手工紡織業不僅是印度的主要出口項目；而且還完全滿足鄰近地區對此商品的需求。婦女主要工作是提供大量的紗線。根據估計，在巔峰時期雇用近 1/4 孟加拉的婦女。然而，英國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開啓了使用機器來生產便宜的棉布後，1820 年孟加拉不只從英國進口布也進口紗線。

雖然仍有許多關於導致去工業化的爭論，但是大部分都同意，婦女承擔喪失工作的主要重擔。機器紡織工廠的效率是遠超過手工織工，甚至於織工以低廉工資都無法與之競爭。

另個相似的例子在西印度，與紡織工廠中的女性工人有關。直到 1930 年前婦女為紡織工廠主要勞動力，雖然她們仍受限於「女性的」職業類型之中。1926 年婦女的受雇率到達頂點；但不

久後，工廠就因為日本產品的競爭而被迫要進行現代化。首先現代化的就是早先婦女所擔任的工作——剔除棉花中的雜物、捲線、將紗線染色等。1929 年，工廠中的女工人數已滑落至 1919 的程度，1939 則是下滑到 3/4 的程度。1960 年代，這種因科技引起的多餘人工仍困擾在紡織工廠之中的婦女。

1970 年代，紡織工家庭以在自家客廳中織床單並賣至當地市場為主要生計來源。然而 1980 年中旬，許多的因素使這項工作無法維持生計，紡織工們必須尋找其他的職業。案例顯示 1980 年代，50% 的男性從事織的工作，75% 的女性從事紡的工作；但到 1990 年代，他們的數量都減少了 25%。雖然紡織工家庭為這個危機羅織許多理由，但最明顯的是產品比不上工廠布料便宜。

印度紡織業和他們的家族企業息息相關；有些企業主動遷移至德里建立公司。大部分企業當需求提高時，都能操作織布機來應付。但他們仍是失敗，因為除了無酬的家內工作外，他們沒有其他的工作經驗。許多政府政策，包括 1990 年代允許無限制的生棉和紗線出口，也迫使企業更加地朝向邊緣化。而且自從男性主控市場產銷，女性在經濟上更沒有控制力。

工作變的更艱難時，紡織工開始在小工廠中當捲線工人，或拿計件工作回家做。雖然婦女的新工作狀況是遠不及理想狀態，她們無法從所做的無技術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但這仍給予她們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並且，收入也加強她們家中地位。

對比

這些紡織業的例子，是以時間和空間作他們所活動的市場為區隔，不同於以婦女本身背景為

區隔的區分。在德里的調查中，這些移居到城市的家庭婦女，突然會被城市的機構分派至遙遠的地區。同樣在西印度工廠，紡織工家庭的婦女她們從事這項工作是因為原有土地產品不足以維持生存。許多獨居或是寡婦女工，因為沒有任何人的扶持，加上無技術及對社會的疏離，使她們對於職業改變的命運是沒有任何的抵抗力。

孟加拉早期紡織業中，獨立工匠在市場上出售紗線賺取現金。這個工作不單只是家庭主婦擔任，即使是有高等社會階級的婦女，也依靠這個來支持她們的家庭。因此，她們對工作有獨立的決定而且也有充分的社會認可。雖然有些是以她們良好品質的紗線而著名，但是她們的技能無疑地仍是在較低的制度層次上。連東印度公司的總裁，也讚賞優良的孟加拉紗線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有人或許會認為他們對於變革會較有預備，但根據顯示，當挑戰來臨時，他們和其他人同樣毫無抵抗力。因為他們發現他們的技術無法用於其他職業上，也沒有管道學習有市場競爭力的技術。根據 Kumar 的資料，孟買的女性工廠工人發起數個抗議罷工；德里的女工為自己尋找其他替代性的工作。但這些 19 世紀初期在孟加拉有著高技術的女性工人，也被迫離開職場。這危機後，孟加拉婦女的工作參與率是遠低於他們早期的高峰期，而且也持續地低於其他在印度的地方。孟加拉的婦女今後只能在家中或特殊的職業中找到工作。這些婦女們過去是家中經濟的主要來源，現在卻是變為依賴者，而唯一留下來的的工作就是家內勞動。

相似性

這三個例子提供幾個相似

點，提供能解釋她們同樣命運的解答。孟加拉紡織工除了一些免費而可得的當地材料外，沒有任何物質資本。所以生產工具非常簡陋，例如用魚下顎骨來梳生棉。紡織時，使用印度紡紗車(charhka)紡中等紗線或用takli來紡優良紗線。這兩個機械都是由當地生產的竹子來製造，這就是所有他們能擁有的工具。而且完全依賴天氣或是陽光影響棉花溼度。唯一減低眼睛壓力的方式是在紡織機前方放置一碗清水。因此，產量非常低，一個月一名女紡織工所能紡的紗線不會超過兩磅。因為缺乏資本，孟加拉紡織工人無法一次購買大量生棉。工作速度慢也意味著沒有標準化可言，同個紡織工的產出，品質是天天在改變。

在此有個弔詭的地方，年青的女孩能紡出著名Dhaka棉布紡織時所需要的好紗線，但是大多數的女孩卻在30歲之前就瞎了眼。

對這些紡織工而言，新式發展的機器是個悲劇。從1818年這些新式的機械生產出的紗線不僅快而且平坦、品質優良。一磅的棉花，由手工來紡織最好的狀況是紡出150捲，一台紡織機卻能紡出300捲。此外，孟加拉紡織工所用的工具500年來都沒有改變。就Habib所注意到，中國的紡織工自從1313年開始使用紡紗輪，而歐洲自1480年使用U型的飛梭。這些發明減輕這些國家紡織工的壓力，並加快紡織速度。直到18世紀之前，這些發展才傳到了孟加拉。

相同的情況重演在現在的德里織工身上，她們在自家中使用的簡陋工具及緩慢的速度是比不上使用動力的速度。因為他們只負擔的起便宜的紗線，所以只能生產一定寬度的布及格子花紋的設計。她們結合兩塊長的布料，以符合床單的寬度，使用混合紗

線使得纖維能夠有一定的強韌度，這產品設計樣式已是20年沒變，在同時期的市場早已充斥便宜的印花Jaipur床單。她們的家內生產沒有能力適應生產新式產品。Action India的研究注意到有較好適應力的手工紡織，能夠使用Jacquard紡織生產出較寬布料。但並沒有多少的家庭知道這項機器，也沒有足夠資本來裝設這設備。紡織工過時的技術是因為他們沒有投入新的知識和技術。婦女不被允許使用任何儘管是當地可獲得的最便宜材料來改良工具。假設不久後，當地的資源變的稀少時(例如，當地的森林生產不足)，或消費偏好的改變，這些紡織工的技術和工具就太過於僵化而不能適應改變，就只能存在生產特殊產品了。

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特別是女紡織工她們沒有獲得外界的知識和資訊的管道。因此，即使可能適應新的變革，她們也沒有辦法得到關於適應的資訊。例如，著名的Lucknow chikan工作的喪失是因為居家的回教婦女沒有直接和市場連接的途徑，陷入只能重覆以傳統的設計來生產產品。SEWA Lucknow集結這些女工，使她們盡可能在工廠中工作並生產新式設計及產品。報告中指出，現在的chikan工作已有大規模而且有利的市場。

技術的教導假若是背誦的方式進行，而非以解釋生產過程中的基本原則來教導紡織工的話，這種教導方式通常對適應也造成了阻礙。她們的傳統提供她們當地物質狀況的資料，特別是關於技術的問題。但這樣的資料並沒有建立更廣的知識系統，也沒有教導她們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可能產生傳遞知識的過程中遺失某部分知識的危機。為了避免這個情況的發生，工人們被教導去注意生產過程的每個步驟--不論是前後有因果關係或

是事實上的生產程序--並視這個過程是不可或缺的。在對於其必要性沒有任何解釋時，這只會造成只相信過去傳統知識而不信任新近改變的心態。這也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為傳統的支持者而非質疑者。

模型背後的邏輯

總之，在紡織業中仍有大量個體化的女工，在極為簡陋的工具基礎上生產可被市場接受的產品。沒有任何方式可加快速度或是品管產品，甚至使之適應改變中的市場狀況。她們對知識或是較好材料的需求，長期以來因為家管的身份而被公部門所忽視。科技並非真正地衝擊婦女紡織業的工作，而是她們的需求長期地被忽視。

這樣的模式不斷重覆，特別是南印度，自古傳統便拒絕給予女性財產和生產資源的控制權。相當多文獻關於否定財產權的模式，特別是可耕種的土地，是父權制控制女性自治權及流動率的重要工具。這也夾雜許多家庭迷思，當中最重要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概念。這個迷思視女性為非工作者(non-worker)，對於家庭的收入沒有太大助益。或者不認為女性的工作是工作(non-work)，加上她們並不視自己為掌握分配支出的掌權者；對家庭的貢獻就是給予家庭舒適及安樂，這就必然演變為對女性的工作不會分配有價生產資源。在某些地區例如Punjab和西南方的地區，這傳統特別強烈，婦女勞動參與率根據報告指出是遠低於現狀。在其他地區，婦女的工作或許仍被承認，但卻低估婦女工作價值或只認為婦女工作只是對於男性收入的補充。雇主過分認為婦女只是補充家庭收入，甚至於後來全職全時的工作都是交由男性工人來填

不只是女性的工作，甚至於是女性的體力或是勞動力，都被認為在社會價值上低於男性。因此家庭就免除分出資源緩和女性在工作上所引起壓力的義務。一個飼養蠶絲繭的 Murshidabae 女性提供明顯例子。在鼎盛時期，飼養工作需要女性一天七至八小時的勞動。但她們仍需要多花兩個小時的時間來煮

飯。家務事被認為是沒有投資任何東西來減輕主婦壓力的價值。

既然女性生涯中，結婚及從事家內事務的再生產被認為是必要的，教育作為勞動市場的條件，在她們的案例中也被視為是次要。因為這些習慣印度婦女工作的閱歷仍是遠遠遜於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的

婦女。這些科技變革持續負面地衝擊印度婦女，被認為與性別身分的本質相關。

III 製藥業和礦業

在另兩個工業：製藥業和礦業，UNU/INTECH 調查的方案

賦權？還是另一種剝削的開端？ 編譯 / 陸玲玲

孟加拉婦女及 Grameen 銀行

編按：

對第三世界婦女進行小額貸款是當今主流社會提昇婦女地位的藥方。然而，除了小額貸款將造成市場膨脹，方便資本進入第三世界的後果外，性別不平等的因素也使得這劑看似滿懷善意的藥方，成了劇毒無比的毒藥。本篇報導便揭露了部份第三世界國家婦女悲慘的真實情狀。

孟加拉婦女及 Grameen 銀行

Romena 從村莊的借貸中心回家後發現她先生十分憤怒，因為她沒有準備好他的早餐。在借貸中心中，她必需等待數個小時，直到所有借貸團體付清一週的分期付款。而為了她先生的紅糖生意，她也借了一些錢，在他離開房子之前，他揍了她一頓。

Romena 是 Grameen 銀行的借貸人之一，Grameen 銀行是位於孟加拉而且聞名世界的小額貸款機構。Romena 的故事由 Aminur Rabman 所記錄，Aminur Rabman 是曼尼托巴(Manitoba)大學人類學博士班的學生，他於 1994 開始進行一項調查，研究銀行是如何改善婦女的生活。此外，他揭露了令人震驚的發現：在他的研究中，有 120 位女性借貸人，70% 的女性在貸款被取消後，受到男性親戚言語上或身體上的攻擊，有增加的趨勢。而這些貸款主要應是為幫助女性賺得生活收入，但多數女性反而被貶為「次等男性」(middle men)，因為她們大多是為配偶或男性親屬而去貸款。

預期之外的結果

這結果是「超出我的預期之外，真是令人震驚」Rahman 說道。Rahman 是由「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的「加拿大青年研究獎金計劃」(the Young Canadian Re-

searcher Award program) 所贊助。雖然 Grameen 銀行被認為是在孟加拉提供貸款給鄉間貧窮婦女而成功的故事，他注意到「仍然有許多借貸人因為這個措施，變得更易受到責難及受到更大限制。銀行的貸款目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賦權 (empowerment)

Rahman 在經濟課程研究寫論文時發展了一項概念 -- 他相信婦女只要能夠擁有基本能夠借貸的信用，就能為使婦女在家庭及社區中更有權力及影響力。「我相信賦權正在進行的研究結果。但我要親眼看看這個賦權是否能延續更長的時間。」他解釋道。

在研究過程中，Rahman 住在一個 Grameen 計劃執行最久的村落中 11 個月。婦女借貸中心從 1980 年就已經在此執行。他不久後發現，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賦權，村落的婦女被利用成為通向資本的橋樑。在他 120 個被研究者當中，108 個被研究者說，男性鼓勵或是影響她們去參與銀行的計劃，藉以獲得基金供男性自己所使用。在一個案例中，一個丈夫威脅他的妻子，除非她去借錢，否則就將她送回她的出生地並且再娶。大體上，超過 60% 的借款都是由男性所使用。

負債的重擔

中，在當時也是進行科技的提昇。在這些工業中，婦女以受薪階級的身分爲企業工作。但後來生產技術的現代化也造成大量女性勞工成爲多餘人力。

20年前，工人團結中心以二十個位於孟買 Thane 地區製藥的小團體作調查研究。在1995年，他

們就相同的十個製藥團體做新的調查研究。發現所有的團體成立於1940至1950年代，由跨國公司成立，這些公司引介數種新式產品及生產技術。他們也是這地區中首先引進大量年青、受過教育的女性在組裝線上工作。這些工業在1970年代蓬勃發展，這些公司也繼續採用

和以往相同的政策。但之後許多的公司就結束在孟買的工廠，在其他的地區重新開始更爲複雜的生產單位。剩下的公司則開始結束當地小規模的工廠而退出生產行列。

這些所有新設立的生产單位，勞動力開始全面的改由爲男

此外，Rahman 發現在村中所有借款中，有78%的小額借款是使用在銀行所准許的項目之外。約有30%用在家用需求上，例如付嫁妝、買機械或是付費給安排家中成員到海外工作的仲介機構。這些花費使得婦女負債累累，迫使她們向其他的錢莊借更多的錢，或求助於男性付借款的利息，甚或賣出家中農產品。例如，Rahman 找到幾個銀行的借貸人殺雞取卵地賣了未來即將豐收的米及水果，就是爲了湊足她們的分期付款。

這個分期付款的壓力也製造家庭的緊張局勢。在Grameen銀行的借款團體中，一群借貸人共同審議團體中的其他個人之貸款申請案。婦女通常會遭受到男性的親屬言語上或身體上的攻擊，就是因爲村內銀行強制性延遲給付，譬如說Romena的例子。而當婦女不能獲得借款或是所借到的錢不如預期時，暴力行爲通常會爆發。Rahman舉Yuri爲例，她們的第二次的借款申請案會受到其他成員的否決所影響。Yuri的先生揍了她一頓然後Rani擋在Yuri前面，Rani也把她的先生牽涉進這場爭執中。最後，兩個家庭都受到身體上的傷害。

暴力下的受害者

“婦女變爲暴力的受害者，像Romena這樣的例子，基本上是因爲她們在社會上缺少權力，”Rahman說。”在家中，女性的權力是少於先生，在借貸中心，以往的有影響力人士或當銀行行員多數是男性時，女性也是沒有權力的。”

除他的發現外，他相信小額貸款，假如被正確運用對發展是個有效工具。在Grameen銀行案例中，他建議：婦女不僅只是借一筆款項，她們要還能自己管理這筆款項。銀行也應該透過更細緻的監督來確保她們是自己在使用這筆錢。“銀行的確有遠大的目的，但在原理和實際狀況間是有個鴻溝的”他最後說道。

Dilu 的故事

小額借款和小型公司即將變成發展的核心要素，而Rahman希望他的研究能在改善計劃案、促進討論、創造對小額信用方案之影響上有新研究。

Rahman訴說著Dilu的故事，她在1980年成爲Grameen銀行借款的一員。身爲一個模範借貸人，她是兩位榮譽模範之一邀請去籌備當地銀行基金會，這個銀行建立於1987年。這些年來，她不斷地受惠於銀行。1993年，她的先生只能不斷地向高利貸借錢、賣土地、牛隻來付他們的分期付款。爲讓家庭從負債中解放，Dilu透過外勞仲介公司到馬來西亞的工廠當工人。Dilu的丈夫得到Grameen銀行貸款的幫助付給仲介公司仲介費。總而言之，Rahman找到13個例子是將貸款用於這個目的。

Grameen 銀行的改革

當Aminur Rahman在1994/95進行研究時，有幾個因爲還貸款項目的不公平，而由銀行收回貸款。他於1997再度回到孟加拉，他發現銀行改變一些對這些需求的回應政策。例如，借款人不用再一週付一次分期付款。其他新措施適用於十年期的借款人，他們現在可以得到儲備基金。其中有許多人使用他們所有的報償去支付他們的債務。”這些改變給予銀行能改變爲一個慈善機構的希望”Rahman說。對銀行成功的再評價

在進行質疑Grameen銀行的成功時，先前的研究是量化的，關注於計劃案、投資的貸款、利潤的極限所涉及的婦女。Aminur Rahman用人類學方法進行調查，是第一個用這個途徑來檢驗銀行的記錄。這個方法包括參與觀察、無結構及深度的面談及收集個案作研究。不過，Rahman出生於孟加拉，所以他對語言及文化的了解程度是勝過於其他研究者的。”婦女訴說著她們的故事，因爲我就像是個兄弟般，待在他們的村落中和他們一起吃飯”他說道。■

性擔任，女性不再受雇用。研究更深入發現，約二十年前那些原先的生產單位就不再雇用女工。每個工廠被限縮於一定的生產項目上，這些生產方式也改為使用全自動機器。主要由女工所擔任的工作--包裝部門是第一個被自動化所取代。女工因而變成多餘勞力，當公司提供退休方案時，她們就立即接受了。

其他也是由UNU/INTECH所贊助的研究方案，是研究在Chattisgarh的鐵礦採礦業。印度的採礦業主要有三種技術--手工採礦、半自動採礦、全自動採礦--採礦方式的使用是由礦石的種類和礦的蘊藏量而決定。手工採礦通常用在小型而蘊藏在表層的礦區。在Chattisgarh地區，就是這種礦區，礦區不是交由私人採礦就是出租給次承包人。在這些地區的調查中，當地的礦工爭取組織工人合作公司的權利，就是為爭取採礦契約。

女礦工通常只受雇於手工採礦的礦區，因為礦區儲存量易快速耗盡，因此經營這些礦區被認為是過渡時期，工人被鋼鐵工廠不定期的召集來工作。所有的工人，不論是替私人的承包商或是工人成立的公司而工作，都是由當地的部落招募而來；如同他們的傳統，勞動力是公平地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組成。

自從鋼鐵工廠對於礦石的需求大增後，管理部門就引進了自動生產機器在除了手工採礦的礦區外的所有採礦業中。工人們被置於半自動的操作系統中，而更為危險的操作就像炸開礦區是由機器執行，但是像切割和舉起礦石仍然是由人工所執行。將礦石運至馬車上，起初是由女礦工所從事，但是後來女礦工的工作就改由機器或男礦工擔任。當表層的礦即將被採盡時，男礦工接受操作機器的訓練。當手工採礦工廠關閉時，男礦工就直接到工廠

的管理之下工作。

換句話說，只要工具和技術沒有變革，女工就繼續工作。此外，當所有的女工被視為多餘人力時，被迫自願地接受退休補償金。女工在手工採礦業的勞動參與率都是加速地下降。

對比及相似之處

在製藥業及採礦業這兩個工業中，女性工作方式是大大不相同。在製藥業，女性在都市中工作且受過良好學校教育。在製藥工廠中，工作早已以性別作區分，她們就被分派至女性的工作，只有少數例子是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工作。

手工採礦業的工人則是由礦區附近的村莊而來。沒人受過正式教育或訓練，但他們也沒有任何以性別為基礎來區分生產工作的傳統。在手工採礦業，女性以一個和男性平等的立足點上分配工作，她們的收入頗為豐碩，因為工作規律且有紀律。除這些差異外，女性在這兩個工業中，當要減少使用科技所產生的多餘人力時，她們比男性更自願退出就業市場。而為何這會發生？

當市場狀況改變，全面要求生產效率提昇時，特別是由女性所擔任的工作要立即科技昇級時，因為生產工具的簡陋以致生產效率不彰，工作出現瓶頸，這個瓶頸就要在變動的經濟狀況中立即更正。同樣的情況在棉花紡織業中出現，在鐵礦採礦業中同樣地也出現。

然而，手工採礦業有段時期是男性與女性同時使用簡陋工具一起工作，一旦工具獲得改善，立即帶來的就是以性別為基礎來區分工作項目的衝擊。即使是男性與女性在經驗及才能沒有差異時，工人性別仍是選擇的標準。女性不被認為是適合新式的工作，女性被決策者的偏見所影

響，決策者反對給予女性新式技能、知識及裝備接近的機會。紡織業中的女工例子中，我們推論出一個偏見，即對於排除女性在較為優良工具及較大產量的經濟利益上。這例子顯示在沒有任何的理由支持下，關於使用新式生產工具雇主仍然是較偏好男性。這是男性抗拒在有價值工具上給予女性信任完全不同的面向。

製藥業顯示另個面向：早期女性大量受雇於機器生產線上，但在下個時期時，卻被認定不適合在自動化機器下工作。或許是因為在生產線，女性多半沒有權力決定生產線的工作，另有他人在操作生產線。女性使用機械錯誤所引起意外的風險，多半是由女性而來而非機器本身。換句話說，自動化的機器是需要女工本身作出某些決策，但這些決策或許會損害機器本身。

性別分工暗指兩個意涵：不願授權給女性有力的工具及較大產量，並且是明白顯示對於女性在使用有價財產的負面判斷。管理者和工會，甚至是公部門的公務員都共同有這種偏見存在著。

女性工人缺乏彈性

在兩個工業中，透過奮鬥後，女性工人有標準化的懷孕津貼，並且在結婚後仍能工作的權力。這或許是管理者後來不願雇用女性工人的理由。但公司仍有其他不願雇用女性工人的理由；自動化後，女性不能跟上快速的生產過程，而且普遍無法充分彈性地配合工作。當被問及此問題，女性工人解釋道這不是因為她們是「嬌貴的」或是「柔弱的」，而是因為並非所有的生產方式都現代化。被選擇昇級的設備，昇級後生產線上增加在工人身上的壓力不是現代化，它變成必需超時及超量地工作。女性工

人發現難以接受這額外的壓力，因為兩個理由：沒有新的勞動力加入她們的工作行列中，而她們的平均年齡是高於替代她們的男性工人。自然地，後來的人是較能夠處理增加的工作負擔。

更重要的是，婦女不能超時或超量工作的原因，是因為當工作量增加時，家務並沒減輕。早期她們能結合這兩項責任，現在則是不再可能。這樣的異議使管理者認為女性的工作彈性是遠不如男性。全球化的潮流中，給予額外的獎金給能夠彈性工時、工作量及工作滿意度的工人，女工適應這個部分的失敗，被她們視為排斥女性工人的一項嚴重的標記。

事實上，並非女工工作無法彈性化，而是再生產重擔造成。婦女需要公共設施，例如便宜而便捷的托兒設施、更多節省勞力措施包括快速準備食物等等，仍是不夠普及於大多數的工廠之中。我們離男性與有職業的妻子分擔家務的社會，仍很遙遠。雇主同樣地沒有考慮到彈性工時的選擇，可能幫助婦女去處理其他有時限的需求，例如孩子接送或是在小孩放假時陪伴他們。也沒有實際上的期待她們在勞力供給方面這麼做。女性工人經由工會幫助下，或許能獲得一些承認；但是調查顯示，父權制認定女性對工作的要求權是次要的。

這裡提出一個相關問題：在許多發展的國家，女性工人在工廠的工作情況近來認為已經改善許多。與早期研究中表達出的憂慮相反，特別是跨國的公司，證明是相當地肯讓女性工人加入，自從他們發現女性反而是更彈性化，甚至於許多老的女工，仍加入勞動中。數個研究發現，生育率和婦女的受雇率是有高度而正面相關。

如同我們所爭論的，印度女性身上的父權控制終必受到經濟

成長力量的挑戰。在南韓，另一個高度父權制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對女性勞動力需求增加，給予女性更多自主權。因此，在1980年間，南韓有大量不婚或是晚婚的成年女性增加趨勢。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泰國女性已改變她們生產模式。在印度1992年30%的婦女在青少年時期就已婚，而不到10%的婦女在24歲之前未婚。於此，她們是比1992年的孟加拉婦女發展更為延遲。印度生產力研究仍顯出，結婚及工作的決定權仍然不在婦女身上。雇主仍然認為印度女性比起其他地方的女性在他們找工作的途徑中仍是較不彈性。

基於相似的理由，在同等絕望的時刻，自營或計件制的女工仍是難以與男工競爭。男性在這狀況下，至少仍有選擇適應工作狀況。回教 Calcutta 服飾業的男工，以高水準的技術聞名；但因為當地只有少量雇用機會提供給他們，為了生存就接受只有微薄工資的長時間工作。在德里服飾業，有相同困境的男工必須移居至其他地區，並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婦女負擔家務，受限制而無法流動，這的確是遠不如男工在這些境況中的適應性。

IV 結論之前：一個評估

多數印度有關於科技對女工衝擊的研究，多將焦點放在選定的工業或服務業上，並有相似悲觀的結論。例如 Ghotoskar 在近來銀行業的研究顯示新式科技的引進，在這個行業中同樣地也是發現女性比較無法適應她們工作。

相反地在主要的部門除採礦業外，近二十年來看到戲劇性的轉變，這些部門使用生產科技反而提高女性雇用率。產量因現代生物科技的引進而增加，強化收穫量的循環過程，而不用改變生產者的操作過程。特別是棉花及

米，只有稍微改變女性傳統上所使用的工具或種植方式。因此，女性分攤增加的雇用量，並生產出兩倍或三倍的穀物。

數個不論是基於次級資料或是田野調查的研究，都顯示女性在這些發展中雇用量增加，但自主權卻沒有明顯改善，特別是與生產相關的技能或權力。她們仍陷於傳統的工作及設備，勞動產量仍低。因此不論她們近來在部門中的所得是多少，不論機器的操作或植物生物工程的改變，農業中的女性對於生產科技方面任何的改變仍沒有防禦能力。如意外事件發生，印度女性的雇用量會大量縮小範圍。

貧窮女性工會(SWEA)所做的調查，提供了女性如何處理這些障礙的可能性。工會試圖確保女性全職雇用並能提供獨立的生計。為此，他們的成員建立貧窮婦女的技能、資源和經驗。但他們意識到一個事實，在現代化世界這些或許是她們喪失她們的市場價值而變為多餘的原因。為使貧窮婦女對於意外變革能有所準備，組織成員決定發表宣言，聲明基於國家提供公民應有之基本要求，工廠應支付她們利潤。國家在這個方面最低限度是提供國家已有的科學知識及科技設備給她們。女性缺乏這些權益是因為沒有和社會接觸的管道及政治力量，這些都是應該給決策者知道的資料。但決策者並不認為女性，特別是文盲的鄉下婦女，能夠具有現代工具、金錢或是權力去做正確的生產決策。這調查描述道，工會組織有時能獲得現代科學知識來處理不同群體的貧窮婦女日復一日所面臨的問題。一旦這個過程明顯的開始時，關於知識和科技釋放的問題，社會的常規卻假設這是超過女性所擁有的才能所能負擔的起的。

在 Gujarat 的牛奶公司，雖然女性是擔任多數照顧乳牛、擠奶

並且送牛奶到集散中心的工作，男性只有從事測量牛奶、評估脂肪質、維持總量等科技工作。這樣的計畫在更遠的村落，因為運送牛奶的困難性而無法實行。SEWA 開始從事一項挑戰，給予必要訓練這些文盲鄉下婦女也能夠管理科學技術；她們也能組織一個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收集分散各處小型生產者的牛奶。在這些過程中，她們長遠的管理給村落帶來了其他的利益，例如基本的健康公共設施。

同樣地，由 SEWA 成員在 Ganespura 所設立的 Vanlaxmi 公司，女性的狀況由一個沒有希望的狀況轉變為一個女性有尊嚴而且能夠養活自己生計的狀況。這個地區長久以來乾旱，女人的工作就是找水、穀物及燃料。近年來生活更加困難，因為可獲得的水和可耕種的土地，都被新設立的工廠所使用。尤其是當傳統的生活方式瓦解後，家園被迫要遷移。

這些案例中，SEWA 幫助女性獲得荒地租約，種植樹、蔬菜和其他作物。利用幾個科學化組織的幫助--特別是 Gujarat 農業大學和印度石化公司--教導婦女如何儲存水並有效使用，及組織作物的生長周期來增加產量，並建立土壤的養分含量避免土壤的侵蝕。婦女能生產作物，而當地的市場已可以銷售這些作物。雖然仍有部分當地掌權者抗拒給予婦女任何資源及權力，但公司持續經營 3-4 年後，這個地區就更可以居住，移居不再是貧窮人唯一的選擇。

婦女知道她們環境的困境，但是對於如何重新改善環境卻沒有任何的概念。她們需要資訊並且連繫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機構。一旦她們認知這事實時，就享受到現代科技的潛能，甚至是她們鄉下的背景都不足以阻擋她們。事實上，她們已藉由動力

耕種機的幫助下，減輕工作的重擔了。

在 Ganespura 的婦女並沒有反抗威脅她們生計的現代工業，因為她們知道傳統生活方式已是無法實行。她們對新概念開放地接受，面臨新發展的衝擊時，設法替自己找尋更多選擇機會。更廣的她們也支持性別教育，並且在某些公共事務上有發言的機會。

其他例子中，婦女得到錄影設備及操作方法。雖然操作員沒有正式受教育，有些人還是文盲，她們仍成功地使用並維持了錄影設備。一般人相信貧窮婦女沒有能力處理複雜設備，事實上，對貧窮婦女而言，只是因為沒有途徑了解印刷、錄影機及錄影帶的科技，一旦發現這些設備對於記錄及出版她們自身的經驗是非常有用的時，她們就會開始使用了。SEWA 成員準備數個記錄奮鬥及成功經驗的記錄錄影帶，這也激勵其他進行相同奮鬥的貧窮婦女。SEWA 在這些例子中的角色是給予婦女處理現代化科技例如錄影設備的自信。後來她們就能開始應付現代科技並視為愉悅的冒險。由專家所帶來的現代科技，是另個開啓女性處理現代科技問題的潛能的方式。沒有這些組織的媒介，她們不知道什麼方法是有幫助的；專家也非常樂意幫助 SEWA。在這過程中，婦女也學習到組織合作團體來對抗反對的壓力團體的重要性。

排除現代化世界？

現代科技支撐了百萬人的生計，利用機器動力的拖撈船使用聲納來捕魚，卻毀了印度海岸魚的生態。一個替代種植及收成穀物的發明，可能摧毀半數印度女工的工作。這個國家的手工紡織已過時了，立即反應在女工身上，幾乎所有女工找不到可供選

擇的工作，這才是真正危機。現行資本主義的權力平衡中，不受控制的現代科技將會只是帶來少數利益，但是卻因摧毀許多的生計而付出更大的成本。這個系統換句話說，是養不起全部的人口。

在維生的經濟中，生產系統是由當地環境配合自然資源的再生產循環，以及加上深入的知識所建立。婦女在日常再生產的活動中獲得這樣的知識，為社會發展維生的食物及醫藥系統扮演重要角色。但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自然與經濟成長的平衡被擾亂，資源的過度開發使大自然來不及恢復。就是因為假設市場力量，配合科技發展，能補足大自然所不能的地方並且取代被毀的資源。

這個國家長久以來被重商主義所擾亂著，印度殖民的力量如同許多發展中的國家，促使這種發展更加快速。獨立之後這個趨勢更加惡化，少數當權者從摧毀大部份人口的傳統生產活動了獲得鉅利。國家的科學團體設法由國家取得的支持及津貼來幫助他們，但女性的需求在其中是最被忽視。一般人不相信這些現代科學的實踐者。

然而，與其對待科學本身為敵人，倒不如去理解在科學發展的過程，階級和性別基礎力量的涉及。這些問題上的抉擇，當權者對獲得的暴利的稀少資源，通常是分配給他們的同夥。社會父權制度下偏見擁有優勢地位，決策者鮮少認為以科學來增加產量或減輕婦女工作重擔是有價值的。這個問題在印度貧窮婦女中更加惡化，因為擁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人及以傳統技能求生存的人們之間，完全缺乏連繫管道，德里貧民窟就呈現此處的空白。除非這些潛在力量關係有戲劇性的改變，科技發展的潛能只會繼續不利於貧窮婦女。

除了開拓方法克服這些障礙，使現代科學技術能為女性帶來利益，印度婦女運動忙於進行宣傳活動，反對經濟的現代化及現代科學的應用。過去在發展過程上的應用，通常有排斥女性的偏見在其中，這個團體將所有的經濟發展和任何現代化科學應用視為是對女性的潛在威脅。任何女性傳統形勢的改變均被視為不均衡，對經濟成長及科技發展作反擊。

由反帝國主義及環保女性主義兩者提倡信念交織成的情勢，卻因兩個運動不同的基礎信念，結果是陷入困惑之中。前者反對私人財產的資本主義發展，藉由現代科學知識的幫助而將勞工去技術化，使大量勞工變成科技下多餘產物。環保女性主義則是責難現代科學，她們認為現代科學應該要如同婦女早期根據"女性主義"革新和再生產，共同指導世界的方式支配並征服自然。

原則上，由這兩個運動所提倡的烏托邦方案差異性頗大。左派運動要改變政經的平衡，支持工人而非資本家，因此現代科學幫助的經濟成長是充滿潛能，能替前者帶來相當大的利益。保護環境及去除父權制下排斥女性的偏見，是環保女性主義的基本目標和宗旨。她們進行一項對於過去印象--當社會在一個與自然再生產循環和諧相處的步調--擁有懷舊之情的活動。只有徹底廢棄現代科學，並且使"女性主義"原則的再現，才能帶來烏托邦的出現。沒有了女性主義，她們認為沒有授予女性權力的可能及維持生存發展的出現。

兩個理論都相似於忽略父權制度，在許多支配女性的層面上是個獨立力量在運作著。前者理論認為資本家提倡勞動性別分工，是為奪取產生於再生產中剩餘物，才創造支配著女性的意識型態。後者理論是認為現代科學

貶低再生產工作價值的原理，不論是對自然或是對女性，都導致對女性的壓抑。

然而，研究中顯示女性的家務被視為只是次要，才是解釋她們面對科技改變的主因。限制她們對外界知識及認知有價資源的管道，同樣使她們對家務沒有協商可能的原因，迫使她們對於無法彈性化處理任何衝擊。沒有任何給予她們知識和技能的指導或賦予她們權力，只因為這個社會放置在她們身上家務是次等價值。只有由公然挑戰或是與父權的統治當局協商，女性才能得到自我的尊敬。

在過去20年來的文獻中，對於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在這個議題有個不斷的批評。馬克斯女性主義者表示，若沒有將父權制分析當成是獨立但交互影響的力量，則不能正確解釋對女性的壓抑。即使在印度婦女運動的脈絡下，主要從貧窮婦女進行求生戰鬥的論點而生的假設，強調內部家務根本性的不公平或許會造成對婦女基本維持的系統--家庭造成威脅。

環保女性主義所處的情勢是更加牢不可破的，或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努力去使之合理地與反帝國主義者並立。指出女性的全部角色就是中立的再生產者，從她們的身旁奪走任何可以幫助她們決定想朝向何種生活的抉擇及專業機構、設定她們只是保護大自然的會中立的會員，都被認為是有害於她們在實行層次方面。例如，婦女在Chipko運動中拼命地為保留Nandadevi森林而奮鬥，因為這是她們唯一食物和燃料的來源。運動也獲得國際的注意，認為是婦女為保護自然未開發狀態的範例。印度政府回應這個國際性的公共形象，採取保護森林的指施宣佈它為自然保護區來保存它的原始狀況。婦女在運動中的奮鬥後，發現她們再也不能觸碰

任何森林的東西，甚至是草地。

誰的選擇？

除了這些批評外，對現代科技的嫌惡仍然在印度婦女運動形成主要基礎。而且在政治上我們應不應該，作為有特權的少數，替沒有特權的人做一個這樣抉擇？有任何的理由使我們相信貧窮女性是反對現代科技益處的？事實上，給她們選擇她們顯出對現代便利性的偏好，例如水龍頭、煤油烤爐或是電視。那些有影響力的決策者從未住過沒有現代化便利性的時代，宣傳其他人應該再次看待這些問題，看似是高度難題。

其次，這些由女性的立足點出發或大部份是由女性所影響的決定，如何讓過程付諸實現？仍有個最初的問題存在，除非她們的家庭贊同她們，那些認知及優先選擇項目才能實施，即使女孩的學校教育是免費的，但許多的女孩仍然是沒有去學校。我們如何保證女性自己能做一個沒有約束的抉擇？還有個基本但常被忽略的問題，如何獲得不同貧窮女性團體的一致性；畢竟，不是所有的貧窮女性團體都是在鄉下或是以傳統的技能而過活。包括誰在何時做什麼事都會因為女性立足點的認知而改變。許多的鄉村女性接受她們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再是合理的，並試圖選擇移居到其他的城鎮去找工作。在擁有巨大的鄉村地區例如印度，我們如何能保證我們的溝通管道在這些變遷中，仍然是敏銳的？

第三，女性或許因為沒有任何的有關於新進科技的資訊，因此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機器摧毀她們的工作是遠遠超過孟加拉傳統紡織工所能想像的。他們認為他們被紗線工廠所裁員是因為他們不良的設備。女性從事組織紮根工作，使得對問題有更真實

的判斷，並將貧窮婦女真實狀況的資料傳達給政策決策者注意。但他們需要與了解此面向的研究者一起行動，在貧窮婦女想出她們的需求前，為無聲的人做代表，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訴求行動。非政府組織和德里的紡織工一起工作，有利於找出一項途徑來改善婦女的產量及新工作上的協商能力，勝過於只是懷念舊有的手工紡織業。

在公共政策上，不足以確保女性關於本身的事務上有自主決定權。更重要的是，每個社會應該有個關於它的公民，不論女性或男性，生活於他們的生命之中的視野。它必需闡明這個權利的概念，確保每個人都有這個權利。這個視野，換句話說會植根於任何可能的地方；但是它也確保了沒有人，甚至於是她自己的選擇，否認了自尊及人性可能達到的地方。如同Nussbaum所說“我們急迫地需要有人類本質及人類在公共政策功能的概念，公共規劃的主要目標應該是使公民不同才能可以展現不同的功能上”。因此，公共政策可能權力過高於某些面向上的私人抉擇。貧窮婦女已是長期以傳統方式生存，或許會選擇避免涉入變革的危險。但是公共政策及方案必需要給予她們改善生活的能力，透過知識的傳授及所有可獲的新機會和科技的管道。允許人們從他們已有知識及從他們傳統束縛之下的利益點作決定。但這還是不夠的，還必需給予所有的線索，使他們了解他們將做的選擇。

非政府組織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信任我們的研究夥伴，因為他們必需要對他們所要幫助的人們的生活有明確而動態的了解。非政府組織和女性一起工作，這是最重要的，因為主流社會，有它的父權制的偏見，需要使女性成為傳統的保管人；因此，它可能或許會替婦女做個未來的想

像，使她們更加適應過去的延續，而非進入新的變革。女性的非政府組織必須要格外警覺，他們的方案並沒有幫助女性克服他們已存的生活方式並找出生存的機會，女性非政府組織必須找出授權給女性方式，並且質疑女性的環境以及要求可供選擇機會的權力。於此，他們的角色和工會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工會至少有正當的權力去要求可能會影響他們會員的科技資訊，而且可進行再訓練或是對失去工作的工人補償。女性的非政府組織則是發現未來的趨勢潮流以及處理這些趨勢的方法。

結論

研究以數個不同背景的婦女們為試驗的例子，並以不同地區、工業和科技改變作交互作用試驗。分析顯示，除許多差異點外，為何女性會成為受害者的理由是驚人的相同。她們的技術通常只能用於傳統的工作中，而給予她們代用品或簡陋的工具只能生產低量的產量。雇主和以男性主導的工會，在許多時機中仍是使用女性調節科技變動時勞力需求的變動。但女性家務責任使得她們在工作上是較少彈性的。簡而言之，女工的性別結構，使得她們特別容易變成科技變革下的多餘產物。

試圖透過分析顯示出印度女性運動支配的形勢，他們質疑科技改變本身，這項疑慮是由如何看待女性自身的困惑而來。透過確認婦女傳統上角色，顯示出將之簡化為女性主義的危機。父權力量在我們的國家中扮演那隻有力的手，分派任務給婦女--保存壓制她們本身的傳統。

這裡有個迫切的需求，建立一個非政府組織基層性工作與研究婦女議題的研究者之間的夥伴關係。的確，在鉅視層面及改變

可能性的遠景上，現代科技的確開展了人類的方便性，但除非女性由日復一日為生存的奮鬥中釋放，她們是沒有機會參與關於未來及自然發展的公共事務決策。

非政府組織及研究者間應形成行動同盟，為了發展社會的新視界--在那所有的成員，不論性別、階級和信仰，都有相同成為完全公民的能力。國家受到父權制的影響，會傾向創造一個排斥女性的偏見形象，而這正是我們社會中主要的阻礙。非政府組織的長處是以從一般人民獲得資訊，而研究者則是扮演知識經理人角色，在國家持續運作著來移除這些視界中的偏見。

在第三世界婦女的重要的時機來臨時，她們對於未知的憂慮，反而被說服去排斥現代科學及技術，我們覺得應該習慣於開始對科學和技術的角色有個新的評價。■（本文出處:Political and Economy Weekly,Dec.19.1998）



◆社會主義國家◆

..... 古巴 婦女解放運動



文 \ Colette Harris 編譯 \ 羅桂美



編按：

作為社會主義的奉行者，古巴對於兩性平等的促進是不遺餘力的，但現實與制度的差異仍然一直困擾著婦女們，不只是古巴，全世界的婦女亦然，本文就古巴的女性運動作一詳盡的剖析。

晚近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因面臨財政困難而紛紛改弦易轍，只有極少數國家仍舊可以繼續堅守其社會主義改革道路，古巴便是其中之一。審視社會變遷歷程，尤其是有關婦女地位的流動與變化，相較於其他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古巴在兩性平權的發展上可說是相當進步的。

各社會主義國家之兩性平等政策雖有許多差異，但其基本方針多是參考革命之後（post-revolutionary），在1920年舉行的第二屆共產國際大會（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中由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決議案而來，該議案的重點如下：

- * 讓女性勞動力由家庭釋出以利其參與社會生產。
- * 持續組織農人家眷讓婦女居於有利位置。
- * 發展公社來共同分攤家務勞動與托兒照顧工作。
- * 務求兩性發展的機會平等。
- * 加強動員女性從事行政工作外，政府當局亦須依照女性團

體的個別需要提供充分的工作條件，而女性成為母親時的精神需求亦須獲得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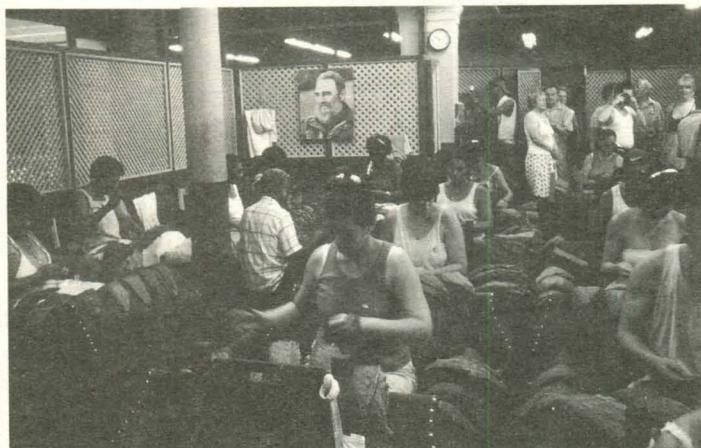
本文將分析焦點指向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代表—古巴，該國在促進兩性平權的推動上，依其社會發展先後應可約略分成五個階段；第一階段談的是，婦女在革命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階段則是物質條件提升對性別平等的促進，在第三、第四階段裡，女性主義者分析性別壓迫的激進轉變，為古巴婦女運動開創新局。最後，則描述了古巴婦女面對金融危機時（the periodo especial）的掙扎與貢獻，以上五個階段看似各自獨立實則環環相扣彼此重疊。

唯物論者（the materialist）在革命成功後（the post-victory period）對兩性平等所持的觀點至今仍然居於主流，後起的基進女性主義由於在

許多層面僅能產生些微影響，故實際上尚未取得重要地位。自從前蘇聯（the former Soviet Union）撤回對古巴的經援後，古巴即陷入經濟危機，此間亦會對婦女運動造成負面影響，然而，這重重的困難卻未能阻礙女性主義繼續前進。

★古巴革命前後的婦女處境

古巴領導階層以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為最高指導原則，在消除性別歧視上，認為讓女性在社會中得以和男性平起平坐最為重要。所以，古巴女性於革命前就已經取得相當程度的形式平等，像是：1917年法庭承認女性無須經由丈夫同意可逕自支配她們自己的財產。1918年離婚正式合法化，勞動法方面則允



古巴雪茄工場女工工作一景

圖片提供 / 馮建三

許女性在工作期間享有產後休假與育嬰的權利。1934年古巴女性便已取得投票權，比起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及歐洲國家都來得更早。1940年立憲禁止性別歧視，保證婦女的公民權不因結婚而喪失，並立法規定同工同酬、確認產假給予，此外，婦女亦享有普遍參政權。1950年民法亦重申女性享有平等的合法權利。

儘管如此，絕大多數的女性還是沒有從這些權利中得到實質的助益，因為真正會離家外出工作的女性其實寥寥可數。在觀念上，以往女性角色的社會期待是留守家中而不是進入勞動場域，對未婚女性來說，若是在外拋頭露臉就必須承擔失去貞節名譽的風險，而已婚女性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誰都不能見。當然，這種道德標準只存在於中產階級，對貧窮人家來說，女性除了外出工作別無選擇。對受過教育的女性而言，職業選擇限致仍多，顯然只有國小教師與社工人員兩種。

產後醫療照顧的貧乏，使得產婦與嬰兒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而做丈夫的為了證明自己具有男性雄風的心態使得節育（birth control）效果不彰，墮胎則是違法的。所以，女性儘管擁有形式上的平等，但實際上仍舊處於社會底層，頻頻遭受性別與階級的雙重歧視。

由此，女性容易把革命當做可以大幅改善她們生活的契機，故積極投入鬥爭行列。在革命期間，婦女不僅提供革命份子安全的庇護所，還幫忙秘密輸送武器，她們尚從事戰時文宣工作甚至潛入敵方搞組織破壞。婦女的貢獻可說是此次革命得以成功的基本要素。

卡斯楚（Castro）支持婦女解放，他認為婦女的作戰能力一點兒也不輸給男性，他甚至不顧軍中袍澤的反對，允許女性在革

命軍隊中自行結社。但是，有組織傾向的婦女卻很少，她們的革命意識大部分起自保家衛國的概念。

卡斯楚和其他革命領袖均瞭解讓婦女參與革命的重要性。要想圖謀國家發展，就必須先讓人民自己團結起來，只有這樣，革命才能夠維持下去，而性別歧視的問題也才能夠獲得解決。為達此一目的，很多機構開始企圖將社會底層的婦女結集起來以共同改造社會，FMC（古巴婦女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Cuban Women）便是此種性質的運動團體。

在革命期間，領導者普遍認為，性別歧視的問題就像男性當初反對女性從軍一樣只是暫時的，只要女性本身能力相當，性別歧視很快就可以被消滅。他們堅信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假設，生產方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改變可連帶解決婦女問題讓婦女獲得解放。1960年8月23日，卡斯楚在一場FMC會議中發表如下的演說：「婦女組織對於消除性別歧視的遺跡可發揮極大的力量。」過了好些年之後，他才知覺到所謂的遺跡實際上佔有多大的份量。

★物質條件提升

對性別平等的助益

有鑑於此，卡斯楚進一步地改善物質條件。首先，讓男女受教育的機會平等，並為學齡前的兒童設立托兒所（day-care centers）；其次，為了降低嬰兒與產婦的死亡率，則加強改進醫療環境與提升醫療品質，讓女性擁有墮胎的自由，並生產簡易的避孕器與降低性激素的藥丸。

1962年開始，FMC不斷鼓勵婦女就業，但實際就業人數卻始終很低；1966年5月，卡斯楚發表演說呼籲百萬婦女同胞進入勞動場域，他根據統計數字推論：每位

女性的年平均所得為1000披索，如此一百萬名的婦女一年將可創造出高達一兆披索的財富價值，他並且強調革命極需要這筆可觀的財富作為後盾，同時，婦女有了收入，便可擺脫對丈夫的經濟依賴，從而獲得解放。

但比起男性，女性跨入勞動場域仍然受限較多；第一，法律禁止女性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有些雇主更直接設限使女性被排除在雇傭之外，因此，婦女可從事的只剩下與家務勞動性質類似的工作，像是紡織或其他輕工業、保姆、教師和護士。第二，雖然還是有少數女性居於管理階層，但她們絕大多數負責的是次要的工作。第三，傳統性別分工的觀念，認為養育子女及操持家事是女性的天職，使得職業婦女的負擔更加沉重。第四，儘管男性對外聲稱鼓勵女性外出工作，但私下卻不願意自己的妻子離開家裡。所以到了1960年代末，許多曾響應卡斯楚號召而投入工作場域的女性旋即又回歸家庭，因為她們身上的包袱實在太重了。不過，隨著托兒所和其他相關服務的日益增加，婦女投入社會生產的比例也跟著大幅提高，1974年總計有59萬的女性在外工作，數量是1959年的3倍，佔勞動市場的25.3%。

1970年代初期古巴民主化加劇；全民參與人民團體的人數增加，並且開始積極討論新的立法議案（newly-proposed laws），1974年在Matanzas省舉行的一場名為the Poder Popular（people's power）的選舉可說是政府發展民主化過程的最高峰，在這場選舉中，由草根組成的人民大會躍升為地方的最高理事會（the highest governing body of the land）。

然而，高度民主化的結果亦未讓女性蒙利，根據一份針對女性選民的調查發現，有54%的女性

表示，在缺乏托兒機構以及家務與工作的雙重負擔下，就算能夠保證當選她們也不會樂意參選。故此次選舉，合計只有7.6%的候選人為女性，其中當選者只有3%，而女性執政的比例在全國只有15%，在黨內只有12.79%。卡斯楚不得不承認在革命結束15年後婦女仍然沒有擺脫不平等遭遇的事實。

西方的女性主義者慣用“second shift”（雙重工作）這個詞彙來形容：女性除了白天和男性一樣得從事有酬勞動外，回到家中還得額外負擔無償家務勞動。在古巴，婦女除了扮演上述的職能角色外，還得另外接受特殊教育到FMC或其他同質機構從事義務性工作；這種超額負擔在當地被稱為“third shift”（三重工作）。在1975年12月第一屆黨代表大會（the First Party Congress）上，「女權運動三議題之調查報告」（Thesis Three on the Full Party Exercise of Women's Equality）被提出討論，此項全國性的調查結果，為1975年「家庭法」（the Family Code）與1976年新憲法（the new Constitution）中關於女性一章，提供了制定的參考基礎。

針對如何減輕女性沉重負擔的問題，該調查結果顯示，民間認為政府應該在有限的財政收支下廣增社福機構，而男性則應該增加做家事的時間與份量。各種降低女性家務勞動時間的計劃在此時紛紛被提出來，像是職業婦女可以享有購買傢俱的優先權，Jaba方案（Plan Jaba）為減少職業婦女上班時身邊袋子的數量，所以讓她們享有下班後再持購物清單取貨的便利，自助餐廳、醫院設立的據點以及營業的時間也都配合女性需要而有所調整。為了滿足職業母親的需要，所以必須再增設托兒所與製造更多優質的消費品。若職業母親為照顧生病

的親人而曠職，企業主不能扣薪，此原則也適用於父親身上。

上述物資供應的改善，目的是為了減輕職業婦女在家務勞動上的負擔，但真正的平等該是夫妻共同均分家務勞動，所以類似婦女購物優先權應該擴大適用於雙薪家庭中的夫妻二人。儘管距離兩性平等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理論上，「家庭分工規章」開啓了女男在家中權利與義務平等分配的新關係，比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在性別平等的推動上可說是領先了非常大一步。這個新規章除了讓婦女家務負擔減輕之外，還為婦女增加了從事政治或行政管理工作的機會。

1979年，只有80萬名女性外出工作，至1984年已增加到114萬2千人（37%）。女性工作類型和從事該工作的人數比例如下：教育29%；勞工25%；服務業23%；行政機關17%；官員5%。（資料來源：Ravenet, Perze, and Toledo 1989:30-31）然而，1980年代初，許多企業基於利益考量於是減少僱用女性，並且增加女性升遷的阻礙，因為「生育法」（the maternity laws）使女性工作者變的相對較為昂貴，儘管婦女產假期間的薪水自1974年起都是由政府支付，但婦女仍舊常為了看護家人的緣故而請假，缺席率高經濟效益就低，所以企業多不願僱用女性，即使僱用也會壓低每個人的薪資。

雖然女性從事

的工作還是以傳統部門為主，但現在（指1993年），在許多以前被認為是男性專屬的行業裡頭也開始發現女性的蹤跡，最新數據顯示女性在各行業的人數比例如下：中高階科技人員53.5%，科學家40%，科學研發41.4%，公共衛生工作70%，醫生40%以上，醫技84.7%，牙醫68.4%，農業工程43%，水利工程40%，獸醫39.5%，改革者與企劃人14%，政府官員26%，省議員28.5%，國代33.9%。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科學學會（the Academy of Science）的會長是由女性出任，而且在高等學校裡，女生比男生更專注於科學研究，其成績也比男生更為出色。

綜合觀之，古巴革命後婦女解放和性別平等是否有更加邁進呢？依照馬列主義的觀點來看，其成果是相當亮麗的。有大量百分比的女性外出工作取得經濟獨立；教育程度女性普遍也比男性來的高，雖然她們在發表政見與較高行政位置上仍舊被迫缺席，但比起20年前已經好太多了。最起碼該有的物質福利也已受到



圖為紀念古巴國父瑪蒂(Marti)的
圖片提供 / 馮建三

重視，像是健康照顧、退休與殘障福利、營養等等，各方面都比革命之前的情況有更長足的進步。但這些也只是就統計數字、建設與法令的變化來判斷而已，總地嚴格來看，要達到真正的平等其實還有好長的路要走。舉例來說，1991年第四屆黨代表大會（the Fourth Party Congress）上，新中央委員會（The new Central Committee）仍然只有17%是女性，而共產黨政治局（the Politburo）25位常委當中亦只有3位是女性。

★ FMC 開啟女性主義新思維

自從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問題」(woman question) 建構初步概念後，與女性解放相關的認識論（the epistemology of women's liberation）就成了一種進步的象徵。第二波的女性主義則發展出複雜的理論架構，不僅保有原先的唯物觀點，另外還加入了觀念學與生物學，而這些都是早期社會學理論所不曾關注的面向。

許多年後，部份古巴女性開始受聘於隸屬官方的社會研究機構，雖名為社會研究，但政府成立該機構的用意其實是為了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方案，而非致力於概念化的過程，因此，任何想要超出這個範圍的人就會被貼上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的標籤，如此做法實際上反而限制了革命與批判意識的進展，也讓理論的發展欠缺自由與想像。

所幸，隨著近10年來政治的逐漸開放，FMC 開始廣邀國外女性主義學者和運動家到古巴來和國內婦女交換經驗，並積極爭取讓古巴女性出席拉丁美洲和西方國家的婦女會議；在FMC的安排下，許多婦女團體得以和官方建立平行對話。古巴政府允許女

性參與拉丁美洲其他各國的婦女會議，對於古巴婦女發展屬於她們自身的女性主義理論產生莫大的助益，她們展開了某些異於馬列主義對於女性的討論，並添入了一些早期為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欠缺的思考面向。

在教育圈和某些公共領域中，一股新的女性自覺在隱然發酵，像是包括哈瓦納大學在內的高等教育學校便新開社會關係研究課程，關於家庭暴力的文章開始在報章雜誌出現，性騷擾亦成為新聞話題，還有一些新的女性團體組成。雖然，這波運動並非由FMC所主導，但確是它開啓了女性主義新的道路。墨西哥、美國及其他美洲國家的女性主義者及教授，紛紛受邀到古巴演講、開座談會、教授有關性別意識的課程以及簡介她們國內的婦女研究計劃等等，而古巴的女性主義者也被邀往該國進行同樣的活動。這一切轉變都是拜FMC之賜。

雖然，這波嶄新的運動為女性主義開創了不少空間，但其影響仍舊有限，不能寄望古巴兩性平等的問題會因此在一夕之間獲得解決。儘管古巴婦女與各國女性主義者接觸的機會相當大，但是外國書籍的難以取得使她們在知識層面的接觸十分有限，因此延緩了古巴女性主義分析的發展，而且對古巴婦女而言，的確還需要花些時間來習慣參與批判的過程，始能衍生出屬於自己品牌的女性主義，讓它有效地與古巴背景發生連結。現下大多數的古巴婦女還未明白運動存在的意義，所以必須先讓她們相信參與運動對它們是有利的才行。不過，至少女性主義的觀念一直都在持續散佈著，儘管速度緩慢，但假以時日還是有可能發展成為全民運動並發揮實際影響的。

★ 古巴新女性主義的形成

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大多數的社會問題都源自於性別不平等，像是：男性必須是陽剛的、女性必須是顧家的愛小孩的、青少年的高懷孕率、高離婚率、家庭暴力、性騷擾、缺乏適當的性教育等等。最近的研究顯示，撇開社會主義和消除階級差異不談，古巴內各社群對性別角色知覺的分歧，其實與其他資本主義社會殊無二致。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工作職權較高的女性，她們在家庭關係的轉換上比較容易成功取得平等地位，此社群的女性由於同時面臨家庭與工作，所以對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衝突體會較深，她們會比較期待男性成員分攤家事。對那些受過低等教育的女性來說，若是能找到一份有尊嚴的工作，她們也會願意放棄部分當家的權力作為丈夫肯合作分擔家事的回饋。

然而，對未曾受過教育的社群而言，即便是那些比父母觀念來的開放的年輕人，她們的想法仍然還是很傳統，對於工作和家庭角色的雙重負擔並沒有絲毫反抗之意，她們同樣很重視經濟自主和工作尊嚴。她們將做家事視為女性該有的美德，女性對自身的這種獨特假設有時候比男性所加諸的性別角色標準更為可怕。而做父親的不僅沒有參與家務工作，就連孩子在學校的情形也不聞不問。此類女性社群由於處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以致於她們害怕去為自己說話，她們不敢嚴正地要求丈夫扛負家庭責任，而且得經常忍受丈夫的敵對行為（hostile behavior），諸如：忽視、貶損、使用雙重的性別標準、不想待在家裡、不願意分擔家事、限制通訊、使用藉口來合理化領薪妻子對家庭的少量經濟支持。敵對行為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家庭暴力，但由於它比較精緻所以女性不容易知覺，她們把

敵對行為歸因成習慣、個性瑕疵、特殊怪僻或溝通不良。對於丈夫的強迫做愛，儘管她們會抱怨自己的欲求和意願不被尊重，但她們並不認為那是強姦。她們通常只有在面臨肢體暴力和口頭辱罵時才會立刻覺醒。

性別權力關係在這兩種社群中形成鮮明的對比。教育背景高且雙方都有工作的夫妻，較常彼此交換意見，對於平等分配家事也較具有共識，做父親的從孩子出生開始就與其維持良好的互動。而教育背景低的家庭，其權力關係就很不一樣，語言溝通在他們之間變的無足輕重，男性擅用外頭的成就來增加自己在家庭的權威，而女性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管家自詡，因為男性的教育並沒有授予他們去扮演其他形象的可能，而女性的教育也不鼓勵她們多用語言去表達與溝通，所以導致雙方心理沒有協調的空間。

教育程度高的確有助於消弱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不平等，但社會壓力對於欲打破這些規範的知識份子來說，才是最難掙脫的隱形枷鎖，我們只要試著回顧自身的經驗就能夠發現。

新的古巴女性主義社會學並不侷限於理論的研究而已，對於性(sexuality)和性別角色(sex roles)的改革，它亦提出了可資實踐的步驟，在Enrique Jos'e Varona Teacher's Training Institute，性教育被納入教師訓練課程之一；此外，該學會女性生物學課的師生開始嘗試去做所謂自覺喚醒(consciousness-raising)的工作，透過小團體的交談會，女性一起檢視個別的經驗與社會結構間的關聯，以提高女性意識。

FMC則在全國將近60個自治地區分設了婦女中心，大多數的女性在遭遇家庭問題時會到該中心尋求援助，每個中心皆有一個由

FMC會員組成的團隊，該團隊的基本成員至少包括了健康教育人員、生物學者、律師和社會工作者，婦女中心的工作人員必須在實踐中發展出一套界定女性問題的研究方法，並且得想出吸引她們參與實踐運動的語彙。有些客戶主動要求婦女中心開辦性教育課程，反應出她們所關心的是近來大量的青少年懷孕問題以及早婚所帶來的高離婚率，婦女中心亦開辦了女性文學與提升性別意識的課程，此外還有以類似女性自我肯定與家庭問題為專題的研討會，而在FMC甚至有少數幾個行動主義者已經開始著手克服性別歧視的問題，並致力於重新塑造女性的自我形象。

★古巴婦女在金融危機時的偉大貢獻

大約在198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the periodo especial)對古巴人民打擊甚深，在商店裡已看不到任何財貨，披索嚴重地貶值，薪水變的完全無用，人民只能憑配給卡(ration card)向政府購買限額商品，1994年5月，古巴的幣值由原先5披索兌1美元，降低到120披索兌1美元的窘況，在此非常時期階段，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決定拋棄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ion)的角色，回歸家庭勞務，女性傳統的家庭角色與價值此時被再度強化。

古巴婦女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婦女所不同的是，她們並沒有走上街頭向政府抗議她們悲慘的生活狀況，反而是盡可能地配合政策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她們認為保有國家、革命以及社會主義是極其必要的，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女性發揮高度的創造力進行廢物利用。她們聲明不管情況多糟，自己都將竭盡所能地去擔保革命之延續。在此階段，古巴婦女的政治傾向亦左右了家

庭成員的政治意識，只要有一位女性持反對立場，其餘家人也都會跟著附和。

她們之所以願意致力於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是因為她們瞭解她們現有的一切都因革命而來，她們既不願意回到革命之前的境地，也不想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有著同樣的命運，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是因為不安—對暴力和戰爭的不安，特別是對古巴裔的美國人和古巴可能在邁阿密反攻入侵感到不安。

如果沒有古巴女性對政治的堅強信念，古巴革命不可能存續得下來，如此意味著女性在革命中分享了決策的權力。

★結語

按照古巴現在的局勢，如果要去預測其未來發展，其實是不太可能的，就好像你去設想古巴最後會成為真正的開放社會嗎？就好像你去問性別平等的發展是否有希望成真？這些問題其實是很無聊的。因為革命本身就是處在危險狀態中。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之下，古巴能夠生存多久也很難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巴能夠存在如此之久大部分得歸功於婦女的貢獻。

眾所公認，古巴各地的婦女解放工作一直都走在良好且正確的方向上，而且也已經為將來的發展奠下了優異的基礎，此項成就是古巴婦女自己打造出來的。如果時間允許，古巴將有可能發展出自發性的婦女運動，而或許這個運動會變得相當有力量，大到足以將女性推向實際的權力位置，大到讓古巴人心中「真人的社會」(a human-centered society)得以實現。■(本文出處：Socialism & Democracy VOL.9, No.1 1995.N.Y.)

美國工運史中

有關 性別 與 階級 的探討

文/Johnna Brenner
譯者/陳昆鴻譯

在一般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中，性別與階級間的關連，是理解工運史的重要議題。若能掌握此關係的複雜性，就能幫助我們面對理論與實踐間的兩難。物質條件與本體之間有什麼關連？文化、論述、性別特徵、情緒等因素，在形塑個人對物質條件的反應時，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階級意識與其他的認同與關係之間的差異性有何關連？當我們要發展階級政治(包含對各種壓迫形式的抗爭)時，這些問題不管是在理論上或是治上都是一大挑戰。

在運史中，為何男工階級通常選擇將女性排除在工會之外(有計劃性的並且不利婦女)的工會形式與策略？即使女性能加入工會，苛刻的性別分工與薪資差異也在工會中被認可。女性主義者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是為了男性的物質利益，女性的低薪正好可以凸顯男人家中的權力(即男人在「養家」)；也有人認為這是心理與文化的因素造成，因而探討男子氣概(masculinity)的文化意涵是如何激發男人的行為，而非衡平地探討造成利益、情緒與文化差異的原因。本文主要是希望能提供一些理解這些關連的方法。

◎生存計劃◎

生存計劃(Survival Project)的概念，意指人類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而採取的各種方式。這些計劃以不同的形式來呈現，從個人的單打獨鬥到集體行為。工人有意識或不經意的採取各種策略，這兩種方式都需要進入各種關係中，以確保基本的生活需求。這些關係的形式，是我們理解工人如何界定團結的界限、自身的位置與他人的差異？如何定義自我(包含性別認同)？世界觀如何形成？的基礎。

在特定社會的歷史脈絡中，

生存計劃的概念，是認識工人動機與行動的一種方式。將反抗與修正概念化的同時，也是文化、個人的、心理的、集體的與社會過程的結果。人同時存在工作場所與社會中，並且是在其中形成自身的理解、感覺與意向。透過團體，工人面對單一雇主時，能享有對勞動市場的某種控制權。另外，又因為多數的工人無法單獨在市場中自我再生產，團體也是資本主義經濟外被建構的交換方式(有酬或無酬勞動)。

世界上並不存在脫離社會實踐的認同(identity)，性別認同也像其他認同一樣，是在日常生活不斷地妥協而形成。工人階級為了生存所採行的策略，是形塑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工作場所中與工作之外，透過家族、鄰居、親戚、朋友的人際網絡等方式凝聚團結與分享人際關係，彼此相互支持。主要的支援網絡包括金錢分享、實物交換、育兒與居住空間的分享。

雖然在歷史上，婦女被工作場所之外的社會網絡所支配，不過，我們不能就此將性別議題限於社區，而認定階級只存在工作場域中。家族的支援網絡、鄰居與工作場所是相互關連的。一直到二十世紀，保護工人的社會連帶與工會組織的支援基礎才出現(合作社運動、罷工等等)。不過，社會連帶卻也變成種族、族群敵對的根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生活網絡不必像早期的資本主義，必須集中於空間上相近的社區。然而，社區仍是決定性的關鍵，決定個人與家庭的福祉，並且是日常生活中再生產工人階級間相對利益的分配。例如，朋友與親戚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就業、找工作的管道；這也是職業結構中，種族、族群分化職業別的根源之一。

不少女性主義者指出，多元的認同(人不只是工人)是無法個

別存在的。一個人在此處是工人，在他處則是女性，在別處更可能是有色人種。女人像男人一樣，也會認同工人的身份。認同會隨工作場所而改變，也會因認同強弱而有別。不過，認同並不會單獨地從性別意義中產生。首先，談論性別對工人的分化，性別則為情緒的認同要素，而性別會限制工人團結的關連。就如同工人的認同是反映物質利益的理性算計一般，性特徵、文化與情感會造成性別分化。不過，工人認同仍有許多變數，也有屬於非意識層次的情緒因素。另一方面，要根據物質關係所建構出的文化意義與性特徵性別認同才會出現，而這些關係與人們的生存策略相關。

性別的文化意義，如同階級的文化意義，都是在群體生活中的男女，在工作內/外所建構的。然而，意義的出現，本身就是充滿政治意涵的過程。人可以選擇如何生存、如何表達、如何反抗、哪裡需要改進。團體中的成員有權決定如何評價事物，這些都是抗爭與妥協的產物。因此，結果就反映出男女在過程中擁有的不同資源（例如、工匠、無技術工人、合法/非法移工、已婚婦女、單身母親）。

男女在工作內/外是如何調適自己，這既反映又再建構性別認同。而團體的歸屬感，則反映出複雜的侷限性與機會。這些限制與機會也是資本主義運作不可化約分割的部份。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兩者的關係。

◎不同部門的策略與市場競爭◎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分化工人是常態。市場的運作機制（排外性格）充滿限制雇主與工人對再生產特定團體的認同。如果說在工作場所中的關係是傾向於提高工人們對共同處境的認知，那麼勞

動市場的競爭則是鼓勵個人採取個別化的策略以利生存。不過，工人可以透過組織的方式克服分散化的趨勢。

性別分析與工會組織策略的選擇，應該將此議題充分考量，以瞭解市場的競爭結構會削弱團結的可能性。雖然，工會必須對立於雇主而存在，不過組織卻常是在一個相對狹隘的基礎上（廠場工會、產業工會），而非整體性的工人組織。工人的集結多半為立即而短暫的經濟利益，不是為一個能長期制約雇主的組織形式。由於這樣的視野，個別化的男工或狹隘的組織策略，就會造成男性認同的影響根源。

事實上，男工不只排除女性，也排除其他男性。例如，工匠藉由學徒制對手藝技術的控制、藉由行規限制潛在就業人口。並非只有性別因素，血緣（只訓練兒子或近親）、地緣（都市印刷工人拒絕鄉村工人加入工會）、種族、族群等也是影響的因素。當雇主不採用學徒制的工匠而雇用較低薪的男工（移工、鄉村工人），工匠行會不是嘗試去組織其他工人，反而採取排外策略，用罷工方式對抗採用非會員的雇主。

與其他產業相較，工匠行會的反抗策略並不特別。產業、職務的差異、對工作職位的競爭，經常會蒙蔽工人的共同利益。技術工人輕視無技術工人、會員輕視非會員、大工會看不起小工會。這種現象經常發生於有族群認同或性別認同的工人之中。狹隘的組織策略，的確是可以保障少數工人的短暫利益，卻也危害了其他工人。（工匠行會就像是產業工人廣義的團結概念，例如，1884-1887年間的騎士黨）當我們在看美國工運史時，並不必然會從工會組織中找到工人認同。

當女工也學會組織工會時，她們就像十九世紀男工一樣，用

同樣的態度對待其他工人，以維持職業界限與勞務分工。有證照的護士，同樣不讓學歷較低的醫院職員加入工會。女教師工會，也經常與校方簽訂不同的契約而遺漏工友與助教的需求。如果工匠固守行會認同，當行業變遷，女性進入她們的工作場所時，女工也會發展自身的認同策略以對抗雇主。勞資間的衝突將會因此而被轉化成性別的衝突。在1920、30年代，女侍就組織工會，並且激發女性的認同，強調男女雖工作有別，不過是同樣都有技術的。到1960年代，她們仍固守這種認同與組織方式，反對年輕女侍的加入。

到了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運動興盛期，年輕女侍向法庭要求進入以往女性被排除在外的的工作（高級餐飲服務與吧台工作）女侍工會才改變策略，放棄工匠行會主義採取更產業化的模式。根據一位經歷此事件的年長女侍領導者，她認為這種作法將會對她們的認同與領導地位嚴重打擊。不過當時的政治情勢和部份的老策略混合，將女侍工會推向新境界。

◎性別分工與策略選擇◎

編按：

認同政治在近來的數年當中，不斷地受到其他團體，例如同性戀團體的策略性運用，認同政治雖然為特殊團體帶來了利益，但是鉅視地以整個社會來看，過度強化個體的殊異性只會帶來對階級整體分化的危機。本文就美國工運史中，探討性別認同及階級認同的兩難，警惕我們認同政治絕非等同於階

佔優勢的工人團體，會透過族群或性別的職業分化來鞏固在勞動市場的利益。此種策略能否成功，取決於修正特定相對利益的分配對雇主是否有利、邊緣團體是否會反抗。若要知道婦女在何時何地能成功地反抗兩性不平等，就必須考察這些利益是如何被建構的，以及在不同的時空中能獲取何種資源。我們有必要將視野延伸出工作場所與勞動市場之外，以理解維持職業藩籬的社會網絡。

育兒的母職，是資源同時也是限制女性工作的手段之一。一方面，女性能因此適應男性與社區對女性的要求。以往（甚至在今天某種程度上）女性間的支援網絡讓女性從事有酬工作。在此一網絡之外，女性也從事政治行動，是社區的一員、也是工會會員。另一方面，育兒責任卻妨礙女性為主體的集體組織，尤其是跨越社區界限的集體行動與抗爭。從歷史上來看，地域性的組織，女性多能在其中扮演領導的角色，爭取自身利益。不過，在跨地區的工人組織，則多被男性壟斷。影響婦女參政之因，不僅是文化的（領導的定義、男性權威的範圍、婦女在公領域的角色），同時也是物質的。前例就可說明育兒責任限制女性的領導權範圍，直到單身、未生小孩或小孩長大的女性工會幹部出現，情況才改善。即使如此，她們在國家層次上的組織，仍是孤立的、缺少集體政治基礎的。

育兒責任塑造女工階級的利益，不過也創造團結與衝突的潛能。單身母親、工人家庭的女孩、單身女性、已婚女性，會採取不同的生存策略，最後，也塑造她們家庭成員對工作的參與方式與反抗。已婚婦女會依靠男性養家，單身女性的策略也會不同於家庭收入是唯一來源的單身母

親。在許多的例子中，已婚婦女支持年輕單身女性組織工會爭取提高薪資。另一方面，男性也會犧牲女性以自抬身價。當已婚婦女放棄尋求男性支持而轉向橫向的結盟時，有時反而會削弱女性團結。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電子產業已婚婦女與單身婦女的衝突表面化，到底誰有權從事男工的職缺。不過戰後，男性養家的意識型態仍是佔據主導的地位。

女工的策略選擇，如男人一般，同樣都被多重又複雜的限制與資源、需求與機會所塑造。這又再次顯示出她們在勞動市場的位置（技術的層級、雇主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反映她們在社區中賴以維生的位置。而社區與其他社區的關係，某些關鍵的因素是：女性要求薪資工作的政治支持度、男工的薪資水平是否足以單獨養家以及社區中的母職規範。

在個案研究中，將證明這些觀點：二次大戰後，先前的男性吧台工會驅趕戰時進入此行業的女吧台員，大多數白人女性工會會員與男性一同爭取從事酒類服務工作的權利，以繼續留在公作崗位。不過，卻要等到三百多名黑人女侍在芝加哥遊行抗議，黑人工會才讓步處理女吧台員的生計問題。1961年當城市法規禁止女性從事吧台工作，導致四百多人失業時，男性主導的工會卻拒絕協助。酒吧女只能轉向社區協助，在市政廳前糾察遊行，黑人報紙也發表同情的報導，不過禁令仍然持續。

由於在餐飲服務業中對黑人女性的種族歧視，限制她們爭取較高的工資，這使白人女侍工作機會增加，白人婦女與黑人婦女的策略選擇也有差異。黑人女侍低工資的現象，是由於男人要維持他們是養家主人的意識型態，因此這種（職業分化、低薪）現象反而在黑人社區中獲得較多的支持與認同。白人女侍則是從

男性那裡得到支持（因為男工參加工會的經驗與對工會的認同）；而黑人女侍由於種族與性別的壓迫，在其內部也出現反對女性工作的聲音，包括黑人報紙。

◎政治鬥爭與性別論述◎

當工會試圖迎合會員、社會大眾與友好中產階級的需求時，性別論述是工會策略選擇的一大負擔。自我表述的策略，不管有無自我意義，都是政治的選擇。男性工會會員是如何描述自己與女工的認知有何差距，這取決於他們是否有必要爭取中產階級的認同或者女同事的壓力。例如，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大多數女工都是年輕單身的。男性會員與中產階級改革者，希望藉由公開討論女性的困境，以爭取女性的支持。這時期的論述，將女性描繪成令人同情的受害者，討論多是圍繞著男女薪資的差異，女性是性別歧視下的被犧牲者（這也是女性被推入火坑賣淫的部份原因）。直到女工可以自我發聲，她們卻強烈反對這種垂憐的口吻，更進一步提出不同得想像，讓這個議題遠離道德的訴求——年輕女罷工者強調他們與男人的相同性，強調他們也是扮演養家的角色，需要賺取工資維持家庭生計。

工會組織策略的選擇、群我認同的差異，深受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團體與正式工人組織的影響。十九、二十世紀間男性工會對女工相關議題激烈的反感，與其說低薪女工會對男性地經濟收入造成威脅，不如說是因為低薪女工進入職場會衝擊男性尊嚴、傳統性別分工與社會自我。女性在工作職場的出現，對男性在組織中建構的團結文化造成威脅。所謂的「團結」，包含界定與維持團體的忠誠，並且能打擊真實的

或想像中的背叛者。對雇主集團而言，如果工人團結組織起來，將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性別差異（對男子氣概的刻意劃分），經常是雇主用來緩和此種不安的利器。不過，對男子氣概的擁護，也只是雇主的策略手段之一。當本世紀末在坦帕（美國西部的一個城市）的雪茄製造產業工會（CMIU），沿用排斥女工的策略，並且不願在性別隔離的次級部門中組織女工。卻有古巴政治難民的男工希望成立新工會，反對無政府工會主義者的工會，為了爭取獨立的工會，他們更進一步希望能組織整個城市的工人。捲雪茄煙女工的會員數，就超過這個新工會人數的四分之一，其成員主要是非美國人與非CMIU會員。男女在這個工會中，同工同酬（雖然男性仍是佔據多數高薪工作），這樣的組織策略是希望男工重新思考性別分工與男子氣概的意義。

在勞工改革主義的情勢之下，在醫院職場工作的女性，也推動反對男性意識型態所建構的性別意義的運動。希望兩性平等，男性醫務人員能將女性視為夥伴，而不是次於男人的第二性。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則協助女工發展女性的語言，並且結合各種政治資源，以求男女能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真平等。

在十九世紀時，勞工基進主義者，希望能有政治上的全面變動，建立像歐文的勞動工社與1880年代的騎士黨（the Knight of Labor）。女性是完整的工會會員，是工人也是社區的一份子。這些觀點對當時女性而言，尤其重要。因為，當時從事有酬勞動的女性仍是少數。為了將女性納入組織，在1886年的騎士黨就承認婦女的投票權。

學者Greenwald的比較研究，主要說明一次大戰間，女性進入男性職場的衝突，男工的策略是

如何受中產女性主義聯盟與工會的影響。在Kansas一個城市總罷工持續一星期，是洗衣店工人（包括男女）為支持電車業採用女性駕駛員，女工同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的分會協助此一罷工。當電車公司想要以低新雇用女工時，運輸產業工會聯合會更為了替女性爭取同工同酬而罷工，這一連串的罷工都贏的Kansas工運組織與WTUL的支持。相反地，在克里福蘭（Cleveland）與底特律（Detroit），男性主導的工會卻是反對雇用女性。此種情境刺激了我們對性別規範的認知，性別規範是無法脫離日常生活與組織過程。而後，基進運動的失敗，使的工會對資本挑戰的士氣低落，也讓處境相對較好的工人生活水平後退，工會部門分化的組織形式，更刺激其他工人找尋更私人化的道路，以維持經濟生活。

◎現狀的啓示◎

在今日美國，男工與女工之間衝突與團結的界限已經徹底改變。女性在工會中的地位、工作能力、領導能力，已經不在是性別關係的主軸。女工會會員，佔了全體會員的40%，代表人數與領導權、女性會員為主的工會，都有顯著的成長。工會順應女性主義的潮流，透過爭取同職同酬、家事假、性騷擾等議題組織女工。工會現在也在墮胎權與同志權等議題上站立場。

不幸的是，這些目標追求的聲音卻掩蓋了追求全體工人勞動條件提昇的目標。在今天的美國工會組織率，是五十年來的新低點。主要是因為男工組織率下降。在不同社會力各自找尋反抗策略的同時，特定群體的利益、認同政治的戰鼓聲卻掩蓋了階級政治的主軸。至今，我們仍無法無視工人的不安、貧富不均的存

在。我們要思索的是如何讓善忘的工人，不再將認同政治誤認為是階級政治。單方面地強調性別（或種族）的衝突，是錯誤的路線，這種策略將會困擾工人是否要採行包容的政治策略。事實上，男工與女工面臨相同的生存難題。柯林頓以福利改革之名，行分化工人之實，削減單身母親的社會福利，將工人分化為受雇者、失業者、有小孩的已婚婦女與單身母親。

以上提及的歷史，說明了工會是如何面對雇主打壓，少部份的邊緣團體會在政治上自我組織。不過，這些策略在虛擬又競爭的勞動市場的脈絡下，皆非改善男女生活的治本之道。男性是否會捍衛既得利益的消失，必須視女性是否有足夠的政治資源而定，讓男人接受在更平等方式下重新定義的男子氣概。換句話說，女性要明白自身的性別利益，男女一同選擇更集體而非個人主義式的解決方式，才能解決目前的兩難。將認同政治等同於階級政治，是不應該犯的錯誤。如今，在美國許多社會運動者與工會組織者已建立一個政治聯盟的共識，透過共同的鬥爭，共同面對工人階級被分化的問題，共同支持所有受壓迫的人民表達他們的意見、利益與需求。■
（本文出處：「On Gender and Class in U.S. Labor History」monthly review volume 50, november 1998.）

簡介

鑒於世界經濟一體化，消費也愈趨同質化。然而，台灣的消費與世界同步，但是消費者的公眾意識卻落後國際一大步。底下即是一些當下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消費者運動的例子：

1. 潔淨衣服運動(CCC—Clean Clothes Campaign)

自從1993年，由國際上多個非政府組織、人權組織與消費者組織雲集於荷蘭，共同發動「潔淨衣服運動」。

運動的目的旨在提醒消費者有權清楚知道她/他們所購買的衣服背後的生產實況、製衣工人的工作環境、以及其待遇是否合乎國際勞工保障的標準。同時，消費者亦有權督促生產商遵從一系列有獨立監察下的生產規約(code of conduct)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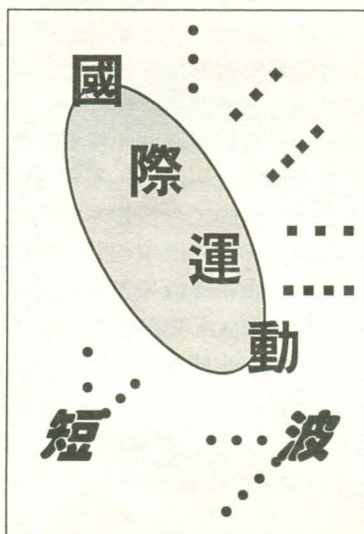
至今有超過一百個非政府組織及工會參加潔淨衣服運動。運動層面擴及比利時、法國、德國、英國、瑞士及美國，亦有愈來愈多的消費者開始重視及履行消費者權益。她/他們關注到購買衣服背後的生產情況是否合乎人到標準的問題，令生產商不得不對工人工作待遇作出改善。

2. 麥粉哥行動(McLibel)

自1980年，倫敦的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組織—已開始隊麥當勞企業再生產過程中對剝削工人、破壞樹林、濫殺動物、減少耕地、生產高脂肪低營養的垃圾食物、以及以親切形象矇騙消費者等行為作出指控。而反當當勞運動亦襲捲歐美。於1997年麥當勞企業更派出五名大律師入稟英

國法院，控告兩名綠色和平組織者Helen & Dave所散發的反麥當勞傳單有詆毀麥當勞產品及其企業聲譽的嫌疑。最後，Helen & Dave在僅餘的民間力量及個人堅忍的意志之下自辯獲勝，替反跨國企業運動打了一劑強心針。

3. 玩具產品安全約章聯盟 (Coalition for the Charter on the Safe Production of Toys)



自八零年代，港資在中國境內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工業生產的份量愈來愈重，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則仍未受到最基本的勞工保障。

1993年5月港資在泰國的開達玩具廠大火釀成189人死亡，469人受傷的慘劇；同年，港資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也燒死了87名工人以及造成47人受傷。因此接二連三的悲劇，促成了一批關注工人福利的香港工人組織者組成「玩具產品安全約章聯盟」，並要求香港玩具生產商與工人組織平等對話，同時承認工人們的集體談判權及獨立監察機制，加快合理賠償工作。另一方面，此聯盟亦向消費者揭露於第三世界玩

具生產工人的惡劣勞動條件，而呼籲消費者拒絕購買此種血染的玩具。

作為一個消費者，個人可以：

當真的要購買跨國公司產品時—

- (1) 再認真想一次，真的非購買此項產品不可嗎？
- (2) 可否不需要此件產品？可否對目前的正使用的產品進行修補，再繼續使用。
- (3) 如果真得決定要購買此件跨國產品之時，你有權詢問商店的售貨員或經理：

- (i) 此件產品的產地來源。
- (ii) 此件跨國公司的貨品的製造商會否保證工人的工作環境及薪酬合國際勞工公約的認可。
- (iii) 工人是否會因組織工會而被解僱。
- (iv) 此貨品的生產過程是否有在一獨立監察的組織下進行生產。
- (v) 寫信/致電有關生產商，以表達你對該貨品生產背後的工人勞動條件的關注。

水水

註1 Code of conduct 放在台灣的脈絡應該是指涉“工作規則”。但是，因為現今國際上所討論的 code of conduct 通常是著眼於大的跨國公司必須要求其承包商遵從其 code of conduct，始能接到生產的訂單，所以，再此不妨將 code of conduct 譯為「生產規約」。

編註：這是由一位來自香港的市民—水水向本雜誌的投書，對於香港及國際間進行的消費者運動所作的簡介。

AsiaMonitor Resource Center

亞洲勞工教育中心

簡介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AMRC)是一個關注亞洲勞工處境的獨立非政府組織(NGOs)。「亞洲勞工資訊中心」為亞洲地區各個工會、勞工團體以及其它非政府組織提供各式資訊、出版品、勞工運動組訓、勞工網絡串連等服務。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的目標與宗旨

支援亞洲地區追求民主且獨立的工人運動是「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最重要的工作目標。基於此，「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支援工人群眾培養自主的力量、培育工作場所內的性別意識、並致力於創造工人群眾參與的空間。我們相信如下的信念，如此將可使工人群眾培養屬於自己的力量。

- * 工人群眾必須接近並使用各式各樣的資訊、工具、與技能，並給與工人彼此交換經驗與意見的機會；
- * 男性和女性工人彼此是平等的；
- * 必須加強國際工人之間的團結；
- * 工人群眾對事物的看法與提出的替選方案必須與行動接合在一起，像是勞教、各種訓練計畫、競選或其他組織策略。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所提供的服務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為下列團體提供服務：

- * 與女性勞動者、工人議題相關的草根性非政府組織；
- * 工運組織者；
- * 從事勞工教育與勞工訓練、勞工安全與衛生、以及致力於勞動人民權益的勞工團體；
- * 關注亞洲勞工權益、勞動基準的國際組織與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
- * 為喚醒世人對亞洲勞工議題的關注，需要特定國家、特定工業資訊的團體；
- * 尋求國際上國家或是南方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研究計畫、資訊交流、分析並分享組織經驗的非政府組織。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所提供的資訊和文獻資料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偵查並處理關於亞洲勞工的各式訊息，包括：

- * 全球性與區域性的趨勢；
- * 一國的政治與社會情勢對勞工的影響；
- * 關於工資與就業的資料；
- * 工會簡介；
- * 職業安全與衛生；
- * 跨國公司；
- * 特殊工業的資料。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所做的研究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與亞洲各地的工人團體進行與亞洲工人議題的相關研究，現在進行的研究案包括：

- * 在亞洲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女性勞工；
- * 跨公司層層轉包對工人的影響；
- *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促進工人權利；
- * 社會條款/管理規則；
- * 緩和貧窮；
- * 中國男方的移民工人；
- * 偵查在運動鞋、成衣、玩具工業中的工人其權益與工作狀況。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所提供的訓練與實習

「亞洲勞工資訊中心」為亞洲工運組織者提供一年期的實習計畫。「亞洲勞工資訊中心」同時亦為工運組織者提供資訊管理、紀錄片拍攝、電腦實習、電子媒體傳播以及參與式的行動研究。

AMRC 聯絡方式及通訊地址

8B, 444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332-1346
Fax: (852)1285-5319

E-Mail:
amrc@hk.super.net

失業保險在屬性上可視為四種社會保險制度中之一種，其他還有健康保險、年金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但其亦為三種就業安全制度之一環，與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等對於勞動力市場具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失業保險在此情況下得扮演兩種角色：一為社會保險的一環，必須符合社會保險的一般目標，發揮所得再分配及安全保障的功能；一為就業安全的一環，其與就業政策息息相關，彼此必須相互配合。

失業保險做為社會安全體系中的一環，乃是利用強制保險的方式由社會共同承擔失業的風險，保障國民就業的安全，並於被保險人發生短期性的非自願失業時給予現金給付，以促進被保險人的生活安定；在消極上維持失業勞工的生活水準，積極上提供就業服務及就業訓練，協助失業者迅速脫離失業狀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所以凡是非自願性失業的勞工都應該能夠申請，而不應該將範圍限縮。但是從今年一月開始實施的「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中卻規定給付條件為：被保險人自今年一月一日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施行後，因所屬投保單位關廠、歇業、休業、轉讓、解散、破產、業務緊縮或因生產技術調整致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等七個原因。光是對於給付條件的規定就已經將失業給付的申請資格侷限在遭遇關廠歇業的勞工，若是一般企業內的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則只有乾瞪眼的份，而適用對象一方面排除了無一定雇主的職業工人、臨時工、契約工和部份工時工，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員工在五人以下的企業員工，此等最邊緣弱勢的高風險失業工人卻被遠拋在失業保險的範疇外！

但即使是遭遇關廠歇業的勞工也並非人人有份，「實施辦法」中對於請領失業給付還規定需：

「(一)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二)至離職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已參加勞工保險滿二年；(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十四日內仍無法接受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因此，凡是剛加入勞保

打了折又縮了水

失業保險

文／溫任遠

未滿兩年的勞工只能祈禱自己的雇主不要太早關廠；至於「無法接受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究竟由誰來判斷？其中留給政府自由解釋的空間過大，勞工難有置喙的餘地。甚至更可悲的是，一位政府官員在某次的勞教場合中就曾表示：「大家不用擔心領不到失業給付，因為如果就業服務機構能夠提供較好的工作，那些就業服務機構的人員早就自己去做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大多數

的就服機構人員都是用約聘的...」，其言下之意，台灣就業服務機構的效能真是可見一般。

另外，在給付標準上，是「以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五十計算，每半個月發給一次」；同時，「若受領失業給付期間另有工作者，其每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總額超過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之八十部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以目前勞工投保勞保的平均月投保薪資經常被雇主以多報少的情形來看，這次的「失業給付」並無法達到所得維持的功能，更遑論幫助勞工維持其失業時的生活水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失業救濟，更諷刺的是這樣的一種近似「救濟」的失業給付，「有幸」得之者真是少之又少，官方數據即顯示，失業保險開辦三個多月來，全國近三十萬的失業人口中，只有212人領到這份失業，總金額不到三百萬，能領到給付者約每人領一萬出頭！而以目前的「失業給付實施辦法」在給付條件與標準的規定看來，政府將對象主要侷限在關廠歇業的失業勞工上，似乎只是在為最近頻頻關廠的雇主們解套，因為這些所謂的「關廠、歇業、破產等」往往只是資本外移的藉口，資本外移、勞工失業，為了避免勞工不滿的情緒繼續醞釀，政府遂提出一項條件苛刻、給付微薄的「失業給付實施辦法」哄騙勞工們，結局是惡性關廠、倒閉的雇主帶著鈔票拍拍屁股走了，勞工們拿自己繳交的稅來維持失業時的生活，還必須感激政府的德政哩。

另外失業保險實施後，據報載失業保險將與資遣費相抵充將為未來修法的研議方向。針對這點，在理念上應釐清失業給付與資遣費是有所不同的。資遣費是工人工作權中斷的補償，失業保險則是照顧失業期間的勞工，這

完全是兩碼事，而且資遣費和失業保險相互抵充，還可能因付出的代價變少了，而產生變相鼓勵資本案資遣工人，反倒產生更多的失業問題！

失業保險做為就業安全的一環，自然必須與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配合，職業訓練的目的在於培育個人的就業能力，而就業服務則在使求職與求才之間的謀合。而失業保險的消極目的為提供失業給付給失業者，而其積極目的為要求在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必須接受職業訓練，因此失業給付是一項協助失業者解決其經濟匱乏的權宜措施。然而，台灣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的成效實在是有目共睹的差，整套的「就業服務法」本來應該是促進本國勞工的就業，在政府政策的作弄

下，成為一套「外勞引進管理手冊」，對待外勞形同監視犯人不說外，對於增進本國勞工就業毫無助益，無怪乎連政府官員都拿就服機構開玩笑。而職業訓練更是糟糕，課程規劃無法符合現實的需要不說，連更新設備的經費都捉襟見肘，只好靠雇主繳交引進外勞的就業安定費，才能使職訓中心改善其設備，不過職業訓練中心的不足，以及接受訓練時的補助過低，無法維持家計，往往使得人們對於接受職訓的意願降低。但隨著加入WTO的腳步加速，我國面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時代，國內經濟屆時將向世界各國開放，而暴露在全球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隨著貿易自由化，生產成本較國外高、受政府保護、競爭力弱之產業面臨被淘汰

的命運，而企業的併購、重組，甚至關廠、外移乃成不可避免的情況，從而對勞動市場以及勞資關係產生衝擊。依據現有之各項研究，推估我國加入WTO後，失業人口由五萬至二十七萬人不等。在面對失業大軍將至的局面，政府在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都尚不健全的情況下，逕自實施「失業給付」，對就業安全制度三者配套的必要性卻又忽視之，在實質意義上實施了一個近似「關廠條款」的失業保險，刻意將適用對象限縮，且給予微薄的給付，此舉猶如給不滿的關廠失業工人些微甜頭嚐嚐，希冀藉此安撫之，但又不想給太多的甜頭。政府此種阿Q式的作法打算欺瞞勞工到何時！■

(本文作者為政大勞工研究所學生)



First appeared in *La démocratie? Parlons-en!*, Paris, Éditions Alain Moreau.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在關廠失業工人的壓力下開辦，但開辦前已關廠的失業工人，則不在給付的行列中。

■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

分類項目	條文內容
適用對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勞保被保險人 2. 受僱於勞保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投保單位 (即有一定雇主,且受僱於五人以上之企業) 3.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給付條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自民國 88/01/01「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施行後,投保單位因(1)關廠(2)歇業(3)休業(4)轉讓(5)解散(6)破產(7)業務緊縮或生產技術調整致所擔任工作確不能勝任等原因,導致的非自願性失業 2.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的意願 3. 至離職辦理勞工保險退保日止,已參加勞保滿二年 4. 向公立就服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十四日內仍無法接受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給付標準及期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每月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50%計 2. 給付期限:按施行日起繳納失業給付保費的累計年資計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未滿五年:每次最高可領 3 個月,再次失業可再領,但合計最高可領 6 個月 2) 滿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次最高可領 6 個月,合計最高可領 12 個月 3) 十年以上:每次最高可領 8 個月,合計最高可領 16 個月 3. 受領人於給付期間另有工作,且每月收入加上給付,超過平均月投保薪資 80%部份,應自失業保險給付中扣除
給付限制	不得領取失業給付之情形: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推介就業或安排職訓 2. 失業期間另有工作,其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 80%者
保費負擔	以不增加勞雇雙方負擔為原則,從原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 6.5%中,調撥 1%作為保費

(鄭怡雯製表整理)

將於今年底實施屆滿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下簡稱「促升條例」)，在年初即由經濟部工業局暗中運作三十名立委提案醞釀延長十年，並準備直接逕付二讀，此舉引來財政部的強烈反應，認為此一條例延長十年將減少政府未來稅收共達五千億元，因此造成財經二部會之間的齟齬。最後的結果是，在二月十日行政院的「當前經濟問題及對策座談會」的預備會中，兩部會之間達成共識，促升條例的租稅優惠將再延長十年，並規定企業用於研發等經費投資，可於當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中抵減，抵減率並由20%提高為25%，同時並取消個人股東的投資抵減優惠措施。

什麼是「促升條例」？簡單的說，也就是企業或個人將資本投資於政府所規定的特定產業與項目上，將可獲得一定程度的租稅優惠，換句話說，站在政府與資本的立場上，這項法令是一個補貼政策，用以降低業者的投資風險並提高所謂的競爭力。而既然是補貼政策，那麼，是拿誰的錢來進行補貼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政府的財政政策猶如是水道中的導流閘，可以決定水流的流向與流量。而這裡的水流，就像是有限的社會資源，因此，政府的財政政策就是一種分配社會資源的工具，它決定了社會資源的配置與使用，進一步並決定了社會的性質與面貌。而這些資源既然是有限的，因此，在配置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排

擠的作用。以促升條例的租稅優惠措施來說，由於所得稅的抵減，勢必會減少稅收，因此，若不是減少公共建設或公共需求的支出，就是要另尋他徑以擴大稅基，而後者通常是以升斗小民做為增加稅收的來源(例如軍公教人員，或是各種各樣的雜征、甚至罰款收入)。因此，最後的後果即是以一般生民的金錢或福利來補貼富有者的投資。

一般說來，所謂的「後進」國家，其政府通常會以這樣的租稅優惠方式來支持、扶植特定產業部門的發展，以協助其面對先進國家在市場上所佔有的優勢。但是，就台灣而言，這樣的租稅優惠，在促進產業升級上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同時，這樣的成就是否如右翼的經濟學者所說的，由於經濟的持續成長，其成果會自然的流出到一般人的身上呢？從八〇年代中期就喊的震天價響的產業升級，在各種獎勵措施下，其實並未取得多大的成就。一方面，台灣的產業結構，依舊是朝高污染、高耗能的塑化產業的深化與擴大方向進行，另一方面，近些年來引以自豪的電子產業，其實幾乎都集中在生產技術已標準化，因此附加價值低的周邊設備上，例如終端機、滑鼠、主機板等等，甚至所謂半導體產業也僅是代工生產(美其名為「專業代工」)，完全缺乏電子資訊產業中最具價值的設計技術能力，因此，所謂的以獎勵方式來帶動產業升級的目標根本並未達成。尤有甚者，這些依賴國家所給予的優惠而獲取利潤的產業，最擅於以「資金外移」來恫嚇政府與民眾，以達成其予取予

求的目的。同時，透過股票上市、轉投資等方式做為財務操作槓桿，在股市中大筆撈錢，卻坑殺一般散戶。等等這些，便是過去十年來以優惠方式企圖進行產業升級的真正結果。

而我們的政府在其中也經常玩弄著兩面手法：一方面疾呼自由化的必要與好處，因此大批大批的出賣公營事業給私人財團，或是著手進行所謂高等教育的自由化、致令學費上漲，甚至將政府職能加以外包(所謂的BOT)；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保護私人資本方面，卻不斷以補貼或紓困的方式來保障私人資本的獲益空間與損失，在施政上完全地向私人資本家一方傾斜。

這些作法不禁令人想起以前曾經在網路上看到的，一篇關於特種營業的營利手法的報導。有些所謂的美容護膚集團，在客人上門時，先以充滿暗示與挑逗的言詞吸引顧客以高於一般行情的價格來進行特別服務，接著，便遊說顧客加入會員，入會費經常在十萬元以上，並說，加入會員之後，可以獲得數十次的免費進一步服務，但若是不加入會員，就只能「點到為止」，甚至挑明了說，不加入會員者所付出的單次高昂消費金額就是用來補貼有錢得以加入會員者可以免費享受的數十次「進一步」服務。最後，若是顧客堅持不加入會員，服務小姐就僅在顧客身上隨便揉捏一番了事。

這樣看來，我們的這個政府不正就像是開窯子的業者嗎？

■ (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系講師)



文 / 陳奕齊

正當台灣政府爲了爭取國際地位與國際空間而擠破頭之時，台灣企業早就在全球商品鍊(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上佔有一定的重要位置，而成爲世界許多名牌產品的實際製造商。此番的成就，真得難以令人相信台灣是缺乏國際能見度的。然而問題是，台商或者台資爲台灣所拓展的國際能見度是正面形象亦或是負面形象就頗值得玩味！再者，當台資成爲活躍於東南亞的跨公司之時，並使得台灣在世界體系座標軸相對挪移之時，台灣似乎都不再只是台灣。

因此，學術界重新對台灣進行定性，並以「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m)來標定台灣在世界體系的座標位置。但是，學術界的反省並不代表台灣進步運動的視野已經擺脫以往窄化的思考，尤其令人沮喪是，當前年一名菲律賓的旅台外傭(domestic helper)在台灣莫名的死亡，並引起菲律賓舉國憤怒之時，台灣上上下下依舊是處於毫無知覺的麻木狀態，對此事一無所知更遑論表達關懷之意。而正當台灣內部在爭辯何爲金錢外交的同時，殊不知台灣對於外勞人權蔑視的臭名早已「名揚國際」。

此外，除了台灣內部對外勞人權的蔑視之外，身處國外的台資企業行徑同樣是令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所詬病。尤其，近幾個月來，台灣企業在外地的拙劣表現更是對台灣的外在形象再三的斲傷。從三個月前的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的『展翅斷指廠』到前一陣子的台塑汞污泥入侵柬埔寨以至一月底於東莞石碣鎮所發生的台資東鉅廠大火都令人對於台灣、台資企業不敢恭維。因爲，東鉅是台灣「致伸」跨國集團的旗下廠商，大火發生之後台灣內部的討論焦點都放在該公司的財務損失，是否會影響其未來表現等等。

然而，因致伸對作業現場的工安之枉顧而招致十四名中國勞工死亡的問題，卻鮮少人置喙。發生工業意外的工廠，是一家塑料廠，大火從其中一幢三層樓高的廠房中竄出，當時有十八名工人正在通宵趕工，經過

大火的肆虐，造成十二名女工以及兩名男工被燒死。據現場消息指稱，火警發生之時，廠房的走火通道被雜物給堵塞，而工廠的滅火設施亦無安裝妥當。因此，這些加班趕工的工人無異是「活活等死」。廠方的疏忽，反應出的是台資企業視工人性命如草芥之心態。

基於此，香港的許多關注勞工權益的組織：亞洲職業傷病者組織網絡、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工業傷亡權益會、香港職工會聯盟等團體於一月二十七日前往台灣駐香港的中華旅行社進行抗議，並表達強烈譴責台資企業長期漠視其雇工權益的惡劣行徑。

值此次抗議期間，恰巧中華電信工會造訪香港，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在獲悉台商的惡劣行徑之後，也參與此次的抗議，並指出：台灣的資本家在再經過勞工運動幾年的努力爭取之後，已經逐步改善勞動條件；但是，身爲台灣自主工會的一員，是無法容忍台資老闆再度使用早期對待台灣工人的手段，來對待其海外企業所聘僱之工人。同時，張理事長更承諾回台灣之後將會繼續關注台資在外剝削工人的行徑；因爲，這不僅傷害了台灣的整體形象，同時更是對台灣工會運動的一種變相打壓：用海外可被剝削的工人，而將資本外移，關閉了台灣的生產基地。

而此次的港台工運連線，算是台灣工會運動國際化的起步。因爲，這是台灣的工會領袖開始注意到台資企業在外勞動剝削的情事並賦予實質行動的一役。從電信工會張緒中理事長的話中，最難得的是，其注意到台灣勞工運動的消長與國際勞工運動是息息相關，台灣工人的命運更是與國際工人命運是休戚與共。所以，『港台工運連線——共同聲討台資企業的外地剝削!!』開啓了台灣工運的另一扇窗。期待此次的連線只是開始，更期盼與國際工運合軌的台灣工運將會有新的活力與新的可能。■

(本文作者爲本社駐港特派員)

結構危機下

的社會運動改革序曲



文/楊友仁

98年12月底行政院推出了台灣房地產市場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項利多政策——「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自1999年起一年內完成購買新屋且完成過戶登記者，由央行提供郵政儲金轉存款1500億元貸款¹，不限首次購屋與無自用住宅，也沒有戶數限制，然而此方案甫一推出就引起輿論的批判以及無殼蝸牛的抗議，公佈五天後行政院雖將1500億方案做出調整，把1500億額度提出300億供首次購屋無自用住宅者購買，不限新成屋，保留另外1200億專供一年內購買新屋者而無資格限制，但仍然引起各界「劫貧濟富」的質疑以及住宅社會運動，到底過程當中暴露了什麼問題？

相對於10年前上一波的房地產熱潮，近來房地產已連續好幾年沒有起色，「七年一循環」的房地產神話已經破滅，根本的原因在於「供需失調」，建商過去對於房地產增值的預期心理以及搶容積的投機心態，在寬鬆的營建融資下大量推案，導致明顯的供過於求，根據官方資料顯示民國76年到87年間平均每年住宅供應量增加21萬戶，而家庭戶數每年只增加15萬戶，平均每年有6萬戶空餘屋囤積，過度的開發造成山坡地的嚴重破壞以及大量餘

屋滯銷，迄今整體空屋數量估計超過100萬戶，空屋率已接近20%，更嚴重的是許多建商都有數十億乃至於數百億的資金積壓在房地產上面²，繼廣三、長億關係企業建設部門營運不佳導致該集團關係金融機構產生危機甚至易主，及東帝士、國揚、仁翔、尖美等企業飽受財務吃緊流言，導致股價重創，公司甚至撤換公司負責人，12月底34家營建上市公司有27家股價跌至新低，營建類股成了「10元俱樂部」。

1997年8月上台的蕭萬長內閣爲了面對金融風暴而採取了一連串的紓困措施，成立「股市穩定基金」，由民營銀行及公營銀行擔任救火隊護盤，並對部分財務壓力沉重的企業進行紓困，要求銀行業對於到期的債權予以展延，這些措施使得銀行業本身也面臨壓力，而1998年10月以來更陸續發生一連串企業與民營金融機構的財務危機，地雷股逐一引爆，受到這樣的衝擊銀行業開始緊縮銀根，首當其衝的就是近年來以高財務槓桿運作、以案養案的營建業。1999年的第一季將是許多營建業者貸款展延到期的關鍵時刻³，在這樣的結構性脈絡以及建商團體多次的遊說下，行政院終於推出這1500億的振興建築

投資業方案，主要的論述基礎爲日本因房地產崩盤而拖垮經濟的經驗，強調此時拯救建築業的必要性是在救金融，蕭萬長更提出「總體經濟之優位性大於公平正義」的說法。

然而就1500億政策的必要性來說，首先是嚴不嚴重的問題，台灣與日本情況並不相同，日本銀行業對於不動產融資放款值達120%，而台灣則是相對地較保守，一般只有6、7成，整體建築融資問題程度被過度誇大，其次是救不救得起來的問題，這1500億適用於今年購買新成屋的優惠房貸只是將問題延後，並沒有解決問題，政策性做多的結果可能將未來兩三年的購屋潛在需求在今年全給擠出來，甚至造成明後年市場更加低迷、加重房地產「硬著陸」全面崩盤的危機，這1500億的決策可說相當粗操，必要性的說法只是幫建商短線解套的說辭。至於就方案的公平性而言，限定購買一年內新成屋而不限首次購屋無疑是補貼有房子的富人多購買新屋，不但打亂價格較低的中古屋市場，補貼對象更是錯置，成爲變相支撐高房價。

雖然10年前房地產狂飆引發的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壓力因爲種種原因而緩和下來⁴，但台灣

住宅問題仍相當嚴重，高自有率的假象隱藏了大量無住屋者存在的事實，房價仍然明顯高於一般家庭年收入5倍以內的合理負擔，過去的住宅補貼(包括國民住宅以及各種購屋優惠貸款等)僅著眼於有能力進場購屋的民眾，無力購屋之低收入民眾住宅問題長期成為政策空窗，而且房地產投機炒作也導致社會財富分配越趨不均等。1月中旬1500億專案房貸開辦後就傳出有多家銀行以額度已滿為由不再受理申請，寬鬆的政策成為建商找人頭戶套現、建商銀行聯合暗槓額度的溫床，許多購屋者與建商之間的紛爭(如建商趁機哄抬價格、簽約後卻貸不到優惠額度等事件)層出不窮，更引起申貸無門的民怨。

面對金權政商結構下的1500億荒謬政策，社會運動於是順勢而起，這一波掌握民氣發動的無殼蝸牛運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並由原先「三合一」的組織擴大其他社運團體的加盟，第一階段係針對行政院1,500億房貸措施不符合公平正義發動抗爭，主要訴求為站在消費權益的立場呼籲民眾「緩買一年」，不要為了賺取少部分的利息補貼而被仍有下跌空間的高房價套牢，要求行政院暫緩1,500億房貸方案並建立相關配套措施⁶，之後經過數次赴行政院抗議並擴大結盟後，在第二階段進一步提出『緩買、抵稅、公平新方案』的訴求，爭取住宅人權，要求照顧弱勢族群的公平方案以及整體住宅及土地政策的時間表。

在無殼蝸牛聯盟發動連署將整體住宅與土地政策的訴求提上檯面後，學者出身的新任營建署長林益厚在1月16日上任後對外界表達願意成立單一窗口推動整體住宅政策，並出面和蝸牛聯盟面對面對話，不過營建署在整個統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中對1500億政策並無主導權，只能消

極地為其辯護，較具體的是林益厚署長願提出住宅資訊系統與整體住宅政策的時間表，將在住宅學會協助下3月提出初步成果，6月提整體政策報內政部與行政院核定，「整體住宅政策會議」討論過程營建署也將邀集相關政府機關、學術機構、相關產業公會以及住宅團體參與，蝸牛聯盟也進一步提出包括發展租賃住宅的「四大方向、12點訴求」民間版房地政策改革主張(參見附錄)，使得運動的第二階段從1500億問題轉向更積極的整體政策改革。

但相較於學術界和蝸牛聯盟對於政策改革方向的共識，營建署整體住宅政策會議中各相關單位對於推動住宅政策的立場並不一致，蝸牛聯盟看出政策統理結構之間並非營建署即可整合，對於營建署扛起後續「整體住宅政策」的推動與落實並不樂觀，加上不滿蕭萬長閣揆位置確保後就無意面對無殼蝸牛的訴求，於是進一步針對主導1500億政策的蕭萬長進行抗議，在非週休二日週末下午持續至蕭萬長官邸前施展「無殼蝸牛天纏功」，以小規模的組織動員和活潑的街頭行動設計持續號召群眾對蕭萬長施壓，這連續幾波的運動對蕭萬長造成很大的壓力，行政院在2月底時將1500億房貸政策進行第二次調整⁷，央行宣佈從1200億新成屋中提撥300億額度供作首購貸款，使

得原本1500億貸款變成900億專供新成屋、600億限首購而不限新成屋。

此外行政院舉辦的「當前經濟問題與對策會議」三大組中的土地與住宅政策分組也形成七點結論，似乎房地政策改革已有所進展，但真正的難題還是在於政策的具體落實以及沉珂已久的不動產金融結構上面，於是無殼蝸牛運動的第三階段發展出體制內政策監督落實與體制外行動施壓的雙軌模式，一方面保持與體制對話、尋找統理結構的縫隙，另一方面組織繼續擴大串聯，並以證交稅調降爭議和賦稅公平議題接軌，將戰線持續延長至經濟正義課題，繼續擴大社會動員。

這波房地產危機可說是台灣近10年來沫經濟逐漸引爆的序曲，對社會運動而言這波的經濟危機係未知的結構性危機，經濟崩盤的可能性多多少少對於運動主體形成一定壓力，但國家機器內部缺乏橫向聯繫、本位主義以及金權政治的統理結構，在因應危機上更是暴露出正當性的危機，世紀末的台灣社會正面臨這結構性的雙重危機，然而危機不正是體制改革的轉機？此次無殼蝸牛運動即掌握在此雙重危機下的迸生(emergent)情勢，架在1500億房貸政策的矛盾上發動住宅社會運動，進而藉力使力推動政策



無殼蝸牛聯盟在台北火車站的肥皂箱活動。圖中發言者即為本文作者。

改革，社運團體後續也嘗試拉出原本各自的工具性領域，擴大社會自主性力量對於結構性雙重危機的關注，暴露體制的根本矛盾，這正是結構危機下的社會運動改革序曲。■

(作者為台大城鄉所博士班研究生，無殼蝸牛聯盟政策組召集人)
附註

1 此項優惠貸款年利率為5.95%，期限20年，寬限期3年，其中政府編列預算補貼利息差額0.85%，20年共計編列149億元，貸款額度台北市每戶250萬元，其餘地區為200萬元。

2 根據證交所資料，1998年前三季全體營建上市34家公司的餘屋以成本計算約有四百九十四億元，在建房屋一千七百九十多億元，土地存貨九百三十多億元，以年利率8%計算，光是34家營建上市公司全年利息支出就有257億元，形成龐大財務壓力。

3 包括最近(88.1.26)宏福集團關係建設公司跳票導致該集團人壽公司傳出財務危機，甚至影響至整個宏福集團，導致自立早報停刊，以及三月份將有300億到期的國揚建設等等。

4 粗略來說兩個原因減緩了高房價問題的壓力，一是房價近幾年的確因供過於求而有所下跌，二是過去的無殼蝸牛可能在這10年內已進場購屋，因而心態上不希望房價崩盤。

5 指的是崔媽媽服務中心、都市改革組織以及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為10年前無殼蝸牛運動沉澱下來的社會資本。

6 包括(1)住宅主管單位的住宅資訊體系(2)金融單位的人頭戶、建商銀行複合體體檢制度(3)消保會的合理方價評估稽核制度等三項。

7 據了解當時1200億購置新成屋貸款部分實際提撥的額度迄今僅有200億，顯示蝸牛聯盟的「緩買一年」訴求得到民眾一定的回應，有意購屋民眾並不急於進場。

附錄 無殼蝸牛聯盟房地政策改革架構

壹、雙管齊下，抑制房地價格

一、改革房地稅制，杜絕投機炒作

- (1) 實施房地產總歸戶與累進稅制，建立透明化資訊
- (2) 改革土地增值稅，採取按實際交易價格課徵增值稅
- (3) 提高非自用住宅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回歸『地價稅為主、增值稅為輔』之土地稅制

二、選擇合理區位，增加低收入戶每坪六萬元以下之勞工住宅與低價住宅提供

三、推動老舊社區更新，提供低價位住宅

貳、釋出餘屋，發展租賃住宅

一、以租稅獎勵建商將空餘屋轉為出租住宅

二、比照購屋貸款利息抵扣額度，由新內閣向新立院提出法律修正案，於87年度申報時開始實施房租抵扣所得稅方案

三、針對低收入消費者需要，由政府以每坪六萬元以下價格批購空餘屋，原價提供低價住宅與勞工住宅

參、照顧弱勢，規畫租金補貼

一、成立『租屋補貼基金』，初期以1,500億為基本目標，長期政策目標為照顧所得最低之10%的家戶 此基金財源包括：

- (1) 初期先由政府提撥國庫1,500億額度以充實本基金，照顧20萬戶最低收入家庭，每月補貼5,000元
- (2) 將國宅基金剩餘部份與歷年末足額由土地增值稅提撥至國宅基金者適度納入本基金，往後並逐年由土地增值稅提撥20%(原先應提撥至國宅基金之部份)，數年後應可歸還國庫並充裕本基金

二、低收入戶、殘障、老人、單親家庭等各種租屋補貼券，照顧各弱勢族群

三、廢止國宅及勞工住宅貸款中之單身歧視條款

肆、改革體制，成立專責機構

一、成立住宅專責機構，推動各項住宅政策

二、落實建築投資業之貸款稽核制度

三、建立整體住宅資訊系統

有關台北 公娼事件

的幾個想法

文 / 卡維波

編按：

公娼存廢問題從隱晦到激烈的辯論，已然引起廣大的社會重視。本文從妓權立場出發，來探討公娼抗爭過程中所遭受的各種質疑，以及這些質疑背後所浮現的意識型態。本文是擁護運動光譜的不同面向之一。

◆緩衝兩年是否回到原點？

台北廢除公娼之後，公娼抗爭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緩廢兩年，給公娼一個緩衝期。因此有人質疑：「緩衝兩年不是回到原點嗎？兩年後還不是一樣要廢娼？」

這個說法假定了台灣社會對於性、對於性工作的觀點不會改變，假定台北市政客的立場不會改變。但是就在短短兩年前，誰會料得到公娼會上街頭？而且台灣現在出現了不少因為公娼事件而有了妓權意識的人，這很重要，因為就在幾年前，台灣社會的女權意識並不普遍，但是現在女權卻成了重要議題。同樣的，妓權意識的傳播當然會改變大家

現在說的「廢娼必然論」，兩年後的民意也未必傾向廢娼，眾多妓權團體絕對會在這兩年內大力鼓吹妓權、捍衛性工作權。

◆工作權就是從倡權，從倡權則是反抗「強迫從良制」的社會。

性工作者要求的「工作權」，就是從娼權。從倡權可以說是妓權的第一步。從倡權不但包括了職業的自由、人生的選擇、個人天賦的發揮等這些精神，也包括了性工作的無罪化、合法化。

在目前的社會體制下，從倡權還有一個特殊意義；在此我要借用「強迫異性戀體制」的概念，來說明目前社會的「強迫從良制」。在女性主義同性戀理論中，當前社會不論在法制和社會文化各方面，都是個強迫女人進入異性戀的體制。同樣的，當前社會也是個強迫女性從良、不得從娼的體制，不但在法制方面，而且在社會文化各方面都使從娼充滿了污名與懲罰。強迫從良制，就是強迫女性免費提供性服務給男人，並且由警察法官和教師來貫徹這個強迫從良制。

同性戀在這個社會遭到壓迫，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這就

是一個異性戀社會。同樣的，性工作者在這個社會遭到壓迫，也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個反娼社會。故而性工作（就像同性戀一樣）不是個什麼「性道德」問題，而是關乎社會結構制度與文化再生產的政治問題，這才是妓權理論的核心問題。

◆為什麼反倡者缺乏同理心？

雖然有關公娼的辯論很多，但是在傳統大眾媒體上有關妓權的理論尚很少見，這是目前公娼辯論的缺點，也是大眾媒體守門人的失職，使得公共論壇獨缺妓權聲音。而一般反倡者的論証總是建立在那幾個從小被灌輸、未經任何反省的簡單道德教條，例如「出賣靈肉違反人性」之類的價值判斷，但是卻提不出什麼辯護自己道德立場的論據。

更有趣的是，有些反倡者還會用一種「如果是你自己的子女從倡」的論証；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從倡，那麼你怎能鼓吹從倡權和妓權呢？這個論証的效力當然是建立在「同理心」的基礎上。不過這個運用同理心的論証，卻反過來証明了這些反倡者最缺乏同理心。怎麼說呢？

何春蕤告訴我，在數年前她開始講「豪爽女人」時，有人會問她：「你願意你自己的女兒也是豪爽女人嗎？」，後來也有人問她：「你願意你自己的女兒也做同性戀嗎？」這類問題。何春蕤告訴對方，當然會很高興女兒做此選擇，因為豪爽女人和同性戀都是令人羨慕的人生選擇。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為什麼那些反倡者沒有同理心去設想妓權份子對性工作的感受和認同呢？許多妓權份子以身為性工作者為榮，或者十分認同性工作者，認為「性工作，好工作」，值得推廣普及；對她們而言，當然沒有「是否願意自己的子女從倡」的問題。可是，為什麼那些反倡者看不到這一點，而卻問出那麼愚蠢的問題呢？

◆缺乏同理心未必是愚蠢，而是心理障礙與社會距離。

不過，也許我們要設身處地的去想像那些反倡者的心理。反倡者未必比一般人更愚蠢，但是某些心理障礙和社會距離，使得反倡者無法去設想妓權份子對性工作的感受和認同。

在心理障礙方面，也許就像對同性戀缺乏同理心的異性戀者一樣，是一種類似「恐同症」(homophobia)的恐倡心理(從幼兒的「聖母/妓女」的二元心理來看，也許這個現象還找得到一些心理分析根據)。當然，也可能是一種心理的抗拒，因為如果反倡者可以設想妓權份子對性工作的感受和認同，反倡者將發現那不過是最「人性」的一種感受和認同，是人類追求各種形式的自由、獨立、幸福、平等、自主…的感受和認同。而心理抗拒的功用就是把倡妓想像成和自己沒有半點相似的異己，是另一個(罪惡的、病態的)人種，因此

反倡者絕對無法設想「妓權份子或倡妓不過就是我身邊的人，她們的心理與行為和一般人無異，只是社會分工的職業不同；在追求工作與人生自主方面，她們甚至有著最高尚的情操！」

在社會距離方面，反倡者之所以無法去設想妓權份子對性工作的感受和認同，最可能原因當然就是：反倡者的社會處境和性工作過於隔絕。如果工作是個普遍的工作，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兼過差的，那麼就不會有目前反倡者的社會距離問題。

◆批評妓嫖雙方「不知羞恥、喪失尊嚴」，實在是個笑話。

反倡者常常罵性工作者「不知羞恥」或「沒有尊嚴」，這也顯示了反倡者和性工作的社會距離。不久之前有個公關酒店被取締，它的牆上就掛著「不知羞恥為何物」的牌子。很多人以為這是罪犯大本營的反社會告白，但是這塊牌子就像許多工廠店家公司所掛的標語牌，基本上是工作紀

律的意義，它在表明性工作的性質就是「不涉及私人」(impersonal)的專業精神；但是社會距離就使得反倡者無法明白這一點。

易言之，如果不明白性工作的「(公共場所的)匿名自我」特性，就會以為性工作者是以「(私領域的)真實自我」來和客人進行性行為交易，因而才會提出「羞恥之心」「喪失尊嚴」之類的問題。事實上，只有在以愛情婚姻家庭為中心的私領域假設中，才會出現「羞恥」的問題。這就好像在私領域人際關係中(例如男友給女友煮飯)就存在著「雙方是否有感情關係」的問題，但是在公領域匿名自我的關係中(例如飯店廚師為顧客燒菜)就沒有「雙方是否有感情關係」的問題。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自小和烹飪職業或餐飲業完全隔絕的人，她的飲食和烹煮關係從來就發生在私領域人際關係中，那麼她很可能會產生廚師是否「虛情假意」的問題。

營業場所的標語牌有時並不



只是給工作者看的「工作規訓」，同時也是給顧客看的，是對於顧客消費的規訓。標語牌是個較為原始素樸的工具，更現代的規訓技術則是透過專業形象、專業工作的流程、環境設計、嚴格程序、獎懲制度…來規訓消費者與工作者。例如，在目前的婦產科醫院，雖然我們沒看到告示醫生病人「請勿有羞恥感或喪失尊嚴感」的標語牌，但是很多人真的還需要這種規訓，而這種規訓也確實透過較為現代的方式在進行中。不過，在婦產科醫院的暴露與觀看生殖器，並不是私領域的人際關係，而是公共場所匿名自我之間的關係，這裡也沒有「病人和醫生是否有曖昧性關係」的問題；因此，批評婦產科的醫生或病人「不知羞恥」是個笑話，正如同批評性工作者「不知羞恥」一樣。（關於這方面更多更深入的探討，請閱讀有關妓權的理論）。

◆「反娼女性」與「女性工作者」的階級鬥爭。

不過，目前台灣一些女性團體或學者個人的反娼，並不能只以社會距離和心理障礙來解釋，之中尚有她們的「擁扁」政治投資。（妓權抗爭當然不是什麼「打扁」，而且只要妨害妓權，也絕對狠狠「打馬」）。但是這些反娼女性所代表的意義，也包含了不同女性群體之間的階級鬥爭。

性關係，而這個男人必須是婚姻中的丈夫。透過這種「性」的控制，女人的性道德會影響她的社會地位身分，進而影響她的階級位置。所以，如果女人偏離了上述的性規範，例如她是婚前性行為的、離婚的、不婚的、被強姦的、紅杏出牆的、女同性戀的、多重性伴侶的、從娼的等等，她的身分地位就會相對低落。在這裡面，收入可能是最高

的從娼者卻享有最低的地位身分。

由於性觀念的變化，傳統上性道德最高位階的守貞婦女，開始面臨到其他婦女的階級競爭。例如再婚或單親婦女的地位身分雖然略差，但現在也未必會影響其階級位置，甚至不婚或離婚女性也可以競選公職。以此趨勢來說，如果「性」不再是個影響婦女地位身分的關鍵因素，那麼那些自主獨立開放、不以家庭為人生歸屬的婦女，就會更因為個人的收入、歷練、能力與經驗（還有個人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職業種類等），而可以取得較高的階級位置。

所以，女性情慾解放運動以及對女人的性控制之鬆綁，特別會影響性價值底層婦女（濫交女人、性變態女人、女同志、通姦女人、娼妓等等）的階級位置。相對的來說，也就影響了位居性價值高層的「好女人」，這些以婚姻家庭為中心的守貞婦女，不能再因為她們和男人的性關係而取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身分，而必須以其他因素來參與在階級位置的競逐中。

照這樣說來，一些女性團體和個人的反娼，就必然有階級競逐的含意和效果。「好女人」和男人的性關係是她們獲取較佳階級位置的一項資產，妓權運動（或豪爽女人運動和女同性戀運動）則正在使這項資產急速貶值。

好女人所支持的「性控制」，不但打壓了各種性多元，而且一直是傳統父權壓迫女性的重要工具。妓權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不但是個性解放運動，也是性別解放的女權運動。

◆為什麼反對賣淫就是歧視娼妓？

在娼妓事件中，有些主張廢娼的人聲稱她們並不歧視娼妓，她們反對賣淫，但不是反對娼妓，亦即，廢娼不等於反娼云云。

性工作者自身當然很清楚上述說法是文字魔術、語言騙局。上述說法也只是廢娼者自己塗脂抹粉，想把自己心狠手辣（斷人生路、陷人困境、奪人尊嚴）的階級鬥爭裝扮成人道關懷。

不過，先讓我們看看這套「反對賣淫，不等於反對或歧視賣淫者」的論調，在其他議題上的應用狀態。

首先，種族主義者在主張種族隔離時也持類似論調。他們宣稱並非歧視有色人種，只是上帝創造出不同膚色的人種，就應該隔離開來，而非混雜，所以黑人不應該混在白人中間。黑人應該回到非洲，黃人回到亞洲等等。

其次，保守的西方教會的論調之一就是：教會反對同性戀，但是並不反對同性戀者，也不是歧視同性戀者，要幫助同性戀者靠神的力量變成異性戀。這是保守教會內一個蠻普遍的運動，有網站、刊物、組織等等，還有成功案例的見證。這套論調的目的則是在向外界宣示教會還是有愛心的。神愛世人，所以也愛同志，故而仇恨的只是同性戀傾向，而非同志。這和廢娼的女性主義者想要宣示自己仍然是女性主義式的「女人愛女人」、「姊妹情誼」，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述兩個論調的最大問題就是：有色人種正是在種族隔離中親身經驗到種族歧視的那一群，有色人種和種族隔離因此根本就是不可分的，故而宣稱「種族隔離不代表歧視有色人種」只是修辭學的騙局。同樣的，同性戀者的特殊性就在於：同性戀的身分和此人的性偏好不可分，同性戀

者是被自己的性所界定的身分，同性戀者就等於她的同性戀偏好，同性戀偏好被視為同志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同性戀傾向當然就是歧視同性戀者。

在這點上，性工作和同性戀等性身分是一樣的：在現代社會，偏差的性（同性戀、性工作、性變態等）不只是一種行爲，還是行爲者的本質屬性，它說明了行爲者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偏差的性」界定了行爲者的身分。「偏差的性行爲」被建構爲一種本質上和其他「日常的行爲」很不相同的行爲，後者並不被視為行爲者的本質屬性。所以，我喝可樂、打高爾夫、坐捷運、穿內褲……都不會界定我爲可樂人、高爾夫人等等。故而，你反對打高爾夫球或捷運，不等於歧視打高爾夫或坐捷運的我。但是性工作這類偏差的性就不同了，性工作被視為性工作者的本質，同性戀被視為同性戀者的本質。

試想：如果「偏差的性」不被視為「偏差性行爲者」的本質，那麼爲什麼會出現「倡妓的社會研究」、「同性戀心理研究」這些碗糕的假科學呢？「倡妓」或「同性戀者」可以成爲被研究的對象，形成專門的研究領域，而「良家婦女」或「異性戀者」則否，這正是在於倡妓和同性戀者被視為是有本質屬性的人種。換句話說，研究者認爲大部分的倡妓（或同性戀者）有某些共通點，有共同的社會成因和心理（家庭童年）因素，值得專業研究；但是「良家婦女」或「異性戀者」則沒有什麼本質或社會與心理因素，因此也不會被當成研究對象，以發現其成因。

這麼說來，倡妓（性工作者）的本質屬性也就是其賣淫的性模式（性工作）。反對性工作的性質，當然就是歧視性工作

力遊行，其訴求之一便是鬥陣為公娼去污名化而努力。一九九八年婦女節前夕，在萬華舉行的反汙名大遊行。



者；因爲性工作者是被自己的工作所界定的身分或人種。

換句話說，現代的「性」建構，就是使「性」（特別是偏差的性）成爲人的本質，故而偏差的性有了社會科學的顯著意義（例如倡妓的社會研究、同性戀心理研究等等這些歧視壓迫性多元的科學工具），是關係到個人的家庭、父母、童年的事情。而透過司法的檔案、社工的案例、心理醫生的病歷、媒體的鏡頭、學者的訪談……這些知識／權力集結來同時建構這些「性」與「性身分人種」。故而，「同性戀、性工作、濫交、通姦……」和「同性戀者、性工作者、濫交者、通姦者……」是不可能區分開來的。廢娼當然就是反娼、就是歧視。

◆「要廢除剝削，所以終究要廢娼」？

或許，還有一種左派語言的廢娼論調：「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工作都是剝削工人的，性工作也不例外。我們要打倒一切剝削，要廢除資本主義的所有商品工作，所以，終究要廢娼。」

首先，目前妓權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性工作無罪化，這個訴

求也表明了性工作尚不是一個正式的勞動工作，性勞動還沒有一般商品的正式性和正當性，它處在一個地下化的、不健全的勞動市場上，比奴隸制進步，不是人口販賣，但是它也絕不像一般工人出賣勞動。換句話說，在性工作無罪化、成爲正式商品、享有文化上的正當性之前，它還不是一般的商品。所以，問題不是說：凡是商品都是剝削勞動者，所以性工作者也是被剝削的；性工作根本還沒有成爲正式商品，還應用不到上述邏輯。更有甚者，性工作目前的非正式商品狀態對於性工作者是非常不利的，不只是被剝削的不利，還有許許多多工作的風險和勞動條件的不利。所以，如果要談什麼廢除商品剝削，絕對也還輪不到性工作。

性工作無罪化以後，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可能有跨國大企業的性工作公司，或者國營的性工作企業，倡妓自營的合作社、股份制，倡妓的個體戶等等不同所有制的形式。妓權運動會歡迎哪些形式、會想要推動哪些制度等等，這要由性工作者自己決定運動策略，也不是簡單的「剝削」觀念就能提供答案的。

◆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性自由社會裡也會有性工作，性工作是好工作。

其實，所謂「終究要廢娼」之說，是歧視性工作的說法。這種論調似乎認為「在大同世界裡，在沒有商品剝削的共產主義天堂裡，在性自由充分的樂園裡，就不會有性勞動存在了」——這完全錯誤！

沒有商品性質的工作當然可能存在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畢竟，那樣的社會還是有人會做各樣的工作、從事各類勞動、進行各色的服務，也許不再是為了生存或生理的目的，而是為了美學目的、為了美德目的、為了愉悅目的、為了人道關懷目的、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目的。但是我看不出來有什麼理由說「人在共產社會將不再從事性工作」。

即使在現代社會裡，我們也看到：人們不見得是因為貧窮、不得已才被迫從事性工作；性工作不是起源自社會不平等或剝削，就像濫交、通姦、S/M、同/雙性戀、愛滋這些性多元不是起源自社會不平等或剝削，雖然有人確實因為迫於生計而從倡，但是還有很多沒有生計問題甚至社經優勢的人從事性工作、認同倡妓、或者渴望從倡。熱愛性工作就像熱愛表演工作、科學研究工作一樣自然。同時，人們也很少是為了性饑渴、缺乏性滿足，才被迫去嫖妓。所以在人人富裕、男女平等、性自由的社會中當然還會有性工作。關於這一點，我曾在別的文章中講過，並且曾提到：把性工作（或同性戀、濫交等）說成是不平等的剝削社會的產物，是在把性工作「病因化」，這都是歧視性工作的說法。

不要歧視性工作！性工作就像家務工作、藝術工作、表演工作…，是個好工作。妓權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讓這個工作變得更好，改善其工作環境、勞動過程、文化形象等等，使性工作者壯大有力量並參與在社會進步趨勢之中。

◆工運、婦運、性運——避免化約主義。

不過在世界各國的工運或左翼運動史裡，確實有歧視性工作、歧視同性戀、歧視性的狀況，同時也有性別歧視的狀況。

這種性歧視和性別歧視，有一部份是歷史眼界的限制。畢竟，不論一個運動在其歷史脈絡中多麼相對的進步，還是常因為種種原因而有其未見之處。故而工運歷史中（包括到今日為止）會有不甚光彩的性歧視和性別歧視「醜聞」。這就好像性運或婦運中也可能會有階級歧視的情形。這些歧視減損了進步運動的彼此共振和可能的加乘效果。

在運動史上，導致「歧視」的主要原因是理論上的化約主義（例如階級化約主義、性別化約主義、性化約主義、族群化約主義等等）。化約主義就是認為運動議題之間可以有一對一的關係，例如，化約主義認為任何一個婦運議題，或者任何一個性別現象與事件，都可以用某個階級因素來解釋，都和某個工運議題相對應。還有，過去常聽到「台灣所有的社會問題都離不開國家認同的矛盾」也是一種通俗的化約主義。所以，如果太簡便地談論某個工運議題的「父權」性質，或者某個婦運議題的「資產階級」性質等等，那就有可能滑入危險的簡化主義。Gayle Rubin在“Thinking Sex”這篇極重要的性運文獻中便指出：性運

的議題不可能被婦運所涵蓋，女性主義在處理性運議題上有其侷限，性別出發的視野無法窮盡性的全部面貌；故而不應將性（sexuality）化約為性別（gender）。

化約主義，一言以蔽之，就是全盤性論述。這個論述包山包海，把所有社會現象一網打盡，而且萬流歸宗，認為社會在結構上有一個決定性的、最大的主宰矛盾。其實，沒有論述真的能無所不包，而當一個論述又要企圖無所不包時，就難免要壓抑與歧視那些不能被包納的了。

但是工運、婦運和性運，並不是只有互相歧視的歷史。許多左派也會在歷史中大力支持性運與婦運（何春蕤〈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性/別研究》「酷兒專題」第3-4期合刊，1998）。畢竟，性運的發展也是在一個複雜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和各方力量互動（何春蕤〈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性/別研究的新視野》，元尊文化1997）。如果運動之間要密切相關、彼此共振，但卻要避免化約，那麼便要發展工運、婦運、性運以外的其他細緻的理論，去複雜化運動的歷史—社會—文化—主體脈絡。

◆妓權即女權、性權即人權、從娼權即工作權、從娼權即身體自主權。

妓權理論不但闡明：從娼權即工作權、從娼權即身體自主權，同時也顯示妓權和女權、性權的共同關懷。妓權運動、女性情慾運動、性別解放、同性戀解放…這些都有相疊之處，更能產生極大共振效果。此處我不擬覆述這些論點。不過，現在也有些女權份子反娼，我認為她們的女

權意識不及格。女權如果不從邊緣女人的生命出發，而從特權女人的觀點出發，就會不及格。歷史上有許多歧視同性戀的、歧視弱勢階級、歧視弱勢種族的女權知識份子，在女權觀念上卻遠遠落後於同性戀的、弱勢階級與種族的男性和女性。

此外，不只女權份子如此，很多激進自由主義的和共產黨的進步人士，也在歷史上排斥同性戀、濫交、通姦、性工作、性變態等等性多元，他們都在性權上失了足。這些歷史文獻到現在都還看得到，例如美國早期左翼反同性戀的文獻，就被同志理論家挖掘了出來，現在來看這些文獻當然有笑話的性質（例如把濫交和同性戀歸因於資本主義的腐敗），然而不少愛說笑的知識份子到今天卻仍在歷史博物館裡裡外外閒逛，渾然不覺要往自己所屬的朝代展覽區歸位。

不過就像女權剛起步時，很多民眾還是用傳統性別觀念來看待婦女議題一樣，性權意識和妓權意識在台灣開始生根時，也有很多民眾用傳統的性觀念來看待性工作，但是這個狀況已經逐漸的起了變化。可是現在還有很多號稱進步的知識份子和人權工作者，竟然都缺乏妓權觀念和性權觀念，這不能不歸咎於他們在知識上的怠惰和不學。我們年輕人要以這些人為殷鑑，不要再用七歲以前習得的性觀念來看性工作。

不過，如果不讀點書，恐怕還是難免用七歲以前的觀念來看性工作。這就好像如果不讀點物理化學，人難免會用七歲以前的魔術世界觀來看物體因果變化。《性／別研究》1 & 2 期，「性工作：妓權觀點」專題（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是入門書，雖然此書出版之後還有很多精彩的妓

權文章問世，但是沒看過此書恐怕也過不了關。

最後我想引用上述那家酒店的標語為結語。（我引用的另一個用意是因為：性的羞恥在童年建構上十分重要；性解放和年齡解放是密切相關的。）

讓我們不知羞恥為何物！■

（作者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

新聞筆記

月	日	報別	新聞摘要
1	1	工商	由經濟部幕後策動，聯合卅餘位立委提案，立法院朝野協商並取得共識，將延長「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至 2009 年止，以優惠的租稅誘因，來刺激產業發展，促進景氣復甦。
1	1	聯合	勞工失業保險給付元月一日正式上路。
1	4	中時	多位職業病專科醫師針對國內勞工體檢問題叢生，一致指責勞委會嚴重失職，並建議監察院應主動調查。
1	7	中時	財政部估計，若「促升條例延長十年」一案獲得通過，未來十年稅收損失將達新台幣五千億元，高科技產業因所得稅負為零，一毛也不用繳。財政部印製說帖並主動與立委溝通，認為不能拿全民納稅錢來貼補高科技產業，以製造更大的不公平。
1	14	聯合	台北市議會以二十比十的票數通過「北市公娼緩廢案暫緩公告」，管理辦法延至三月十五日議會召開再議，公娼自救會誓言抗爭到底。
1	14	工商	勞委會決定動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失業勞工健保保費增加部份，補助期限最長為六個月，並採事後核退方式進行，即先自付失業期間的健保費，待恢復就業後，再申請補助。
1	16	中時	勞委會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內容包括平均工資計算標準由六個月改為一年，且工資總額不包括延長工時的工資、例假日、休假日、特休工作的加給工資。此一修正將使退休金、資遣費大幅縮水。
1	17	聯合	中央銀行表示，在金融風暴之後，將重新考慮西元 2000 年外匯進出口是否全面自由化。
1	18	聯合	台北市公車處駕駛林正修疑因長期工作致發生心肌梗塞，北市職業病鑑定委員會檢定為職業病，經勞工局長鄭村棋協調，公車處人事室同意給與優惠退休，此案對未來職災申訴案例具有指標作用。
1	19	聯合、工商	台鐵工會表示，由於政府允諾將台鐵「資位人員」退休制度由「恩給制」改為「儲金制」，卻延宕三年未實施，不排除在除夕當天發動員工「依法休假」。傍晚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以代理院長的身分火速同意台鐵資位人員改為適用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勞委會表示春節集體休假屬於不合法的實質罷工行為，勞工若執意而為將付出解僱的代價。
1	21	聯合	產業界提議政府在台中港或其他港埠選擇三百至五百公頃土地，成立「境外工業區」，全部引用大陸勞工或外勞，並提供優惠賦稅，防止資本流失。經建會主委江炳坤認為可作為研究的方向。
1	21	聯合	宏碁電腦董事長施振榮表示，支持促升條例延長十年，政府應將稅收減少當作產業升級的投資。
1	21	工商	為彌補失業保險開辦前即已失業勞工的「就業補助金實施作業要點」出爐，凡失業給付開辦前三年內因關廠歇業等原因失業工人，可依離職退保前六個月勞保投保薪資的 50%，請領就業補助金，最多領三個月。

1	21	聯合	自立早報停刊，擬資遣員工 250 人，自立晚報亦發不出薪水，工會發起抗爭爭取權益，在以現金支付早報員工工資遣費，以及新老闆中農集團江道生接手晚報之後，工會決定停止罷工。(聯合 0126、0206)
1	22	工商	交通部召開中華電信民營化專案小組會議，決定近期公告甄選「公股釋出執行顧問」，研擬全民釋股、員工認股、公開上市等作業，因釋股方案提前曝光，引起中華電信工會強烈抗議。
1	26	聯合	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主任蕭淑燕指出，部份企業只知設法降低勞力成本，大量引進外勞，而不顧本勞的生存權與工作權，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
1	27	經濟	省屬三行庫工會抗議省府員工跳級轉任，此舉嚴重打擊行庫內部員工工作士氣，並要求限制未來轉任名額並不得跳級銓敘。
1	27	中晚	台北市公娼管理辦法依法應於本日生效，不過由於民進黨議員質疑公娼收費標準未送議會審理，使得緩衝廢娼生效期再生變數。
1	28	經濟	台灣駐泰國代表黃顯榮表示，為避免人力仲介商中間剝削，中泰勞工部長將於三月簽訂專案引進泰勞的協定，以國對國的形式，引進泰勞來台進行重大工程建設。
1	28	經濟	在東南亞金融風暴後，泰國資產大為貶值，國民黨黨管會主委劉泰英繼去年集合黨管會、東南亞控股公司與中華開發投資 1 億美元於泰國後，今年將再投資 1-2 億美元。
1	29	工商	經建會表示，為建全勞動力市場，決定於一年內推動完成勞退新制度，建立勞工帳戶，將勞工退休準備金改採為「確定提撥制」，雇主按月提撥薪資的 6% 至勞工個人專屬帳戶，若勞工轉換雇主，原有勞退金仍可積累。
2	2	中時	前北市公娼官秀琴與「佳佳」服用安眠藥自殺獲救，以抗議民進黨議員三番兩次阻撓公娼復業，二十餘位公娼自救會成員於 2 月 1 號中午赴民進黨籍市議員段宜康服務處抗議，要求段宜康在五天之內連署提案儘速審查公娼費率案，但因段宜康出國而無法與自救會代表對話。
2	8	聯合	為振興股市，財政部長邱正雄宣布實施三項短期措施，包括證券金融公司及證券商等融資融券授信機構得承受斷頭但賣不掉的股票，此一措施暫訂實施三個月；擴大上市股票的個股交易資訊；配合法務部專案查緝股票流言，逐案提供檢舉獎金。
2	9	立報	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公佈我國勞工罹患精神疾病工作報告；以性別分，男性壓力較大，罹患精神病比例較高；以年齡分，四十五至五十歲年齡層壓力最大；以職業分，從事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壓力最大。
2	9	立報	勞委會同意擴大辦理聘雇外籍監護工的申請，初步估計將會增加三千名外籍監護工，但未立案之老人安養機構則不在申請之列。

2	10	經濟	經建會公布該會研擬的「強化經濟體質方案」，對於當前經濟問題的解決，經建會提出七大中長期對策，分別是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協助中小企業發展、改進金融制度、推動企業再造、健全住宅及土地管理制度、規範投資審議流程及權責、改進勞動法制等。
2	12	聯合	行政院召開「當前經濟問題及對策」座談會，民進黨主張規範政黨不得經營投資及營利事業，新黨要求強制變賣國民黨黨營事業，國民黨投管會主委劉泰英表示，國民黨辦企業應由國民黨全代會決定，與在野黨無關。
2	12	聯合	行政院長蕭萬長表示，促產條例將延長施行十年；研發與人才培訓等投資抵減的上限將由 20% 提高到 25%；重要科技與投資事業的五年免稅將持續實施。
2	13	中時	在「企業再造與勞動法制」座談會中，台灣區營造公會理事長潘俊榮指出台灣的外勞薪資為全球最高，外勞在台居留期限過短，造成雇主負擔過重。
2	20	中時、聯合	財政部為搶救金融機構，祭出六大金融再造措施，包括調降存款準備率、降低銀行業營業稅率、取消公司債和金融債券交易稅、提高外資投入股市上限至 50%，鼓勵金融機構合併，以及放寬銀行業可承受擔保品不足的質押股票。
2	20	聯合	台北捷運板橋線潛水夫症勞資爭議，在罹病工人持續抗議與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的調解下，日籍承包商鹿島建設公司同意賠償，賠償金初步定為每名最低七十萬元。
2	21	工商	行政院研考會建議在勞委會下增設「外勞管理服務中心」，依各事業單位產業升級的可能，對雇主採取差別費率收取就業安定費；或在各縣市設立「外勞服務所」，負責管理外勞來台前後所有事務。
2	21	工商	全國工總理事長高清愿呼籲政府恢復外勞進口配額，副總統連戰強調，外勞為補充性而非替代性勞力。
2	22	聯合	經建會表示，雖然台灣失業率逐漸升高，但並未打算縮減外勞額度，裁退外勞不一定能使本勞獲得工作，也許企業主會以關場回應政策，因此台灣的外勞政策只是大幅減緩外勞增加的速度，而非不引進外勞。
2	23	聯合	台北市政府將編列三億元，成立勞資爭議訴訟及生活補貼基金。
2	23	聯合	勞委會擬將勞工退休金原規劃雇主必須提撥薪資 6% 的方案，調降至 4.75%。此一政策變化，引起勞工團體強烈反彈。
2	23	聯合	華隆公司中和廠及桃園第二分廠昨天起關廠，員工休完十七天年假，上班才知道面臨資遣，數百名員工譁然。
2	23	聯合	國民黨高層針對證交稅率達成修法共識，授權政院彈性調整。
2	24	聯合	在兩稅合一、金融業營業稅稅率調降的情況下，財政部長邱正雄表示，現在財政實難籌出錢來開辦國民年金。國民年金可能無法如期在民國八十九年開辦。
2	24	聯合	安鋒旗下的屏東內埔群翔公司因營運困難停產，員工面臨資遣，勞資雙方因資遣費給付爭論不休。

2	24	聯合	民進黨聲明蕭揆應請辭的理由，包括蕭內閣財經政策多次搖擺不定，在財經政策乃至證交稅爭議過程中，蕭內閣在總統府及工商大老壓力下，改變原先不調降證交稅的立場，有損財經內閣形象。
2	24	聯合	經濟部規劃完成電業自由化方案，以兩階段方式完成，經濟部希望在2008年二月前，台電仍可維持綜合電業，及兼營發電業、配電業、輸電業，但之後台電將不再維持綜合電業，行政院則希望能將日程表提前。
2	25	聯合	有二十二年歷史的福樂食品中壢廠，下月底結束牛奶生產線，今年底前結束冰淇淋生產線後關廠，宣告福樂牛奶和冰淇淋在台基地結束，二百位員工全部資遣。
2	26	聯合	減稅太多已迫使政府必需擴大舉債，採取更大規模的赤字預算。財政部已準備修正公共債務法，研擬提高各級政府每年舉債上限。
2	26	聯合	李登輝總統以國民黨主席身份發表挽救國內經濟三個步驟：一是重整金融市場，二是改組農會信用部及信合社，以及輔導銀行合併，三是改善證券金融單位資金問題，安定股市。
2	26	聯合	由於部份國民黨籍立委全力反對調降證交稅，以及在野黨立委擬對蕭揆提出不信任案的砲聲隆隆中，高度緊張的證交稅率機動調整，因李登輝表達證交稅率不一定要降，化解了僵局。
2	27	聯合	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表示，財政危機已經出現了，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的預算幾乎編不出來。
2	27	聯合	主計長韋端建議成立基金，以舉債方式籌開國民年金財源，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反對，經建會仍主張以加稅方式開辦。

(倪世傑、鄭怡雯、許根魁整理)

感 謝 您

1999年一月以來的捐款贊助者名單

梁春富 溫慶三 許偉森 溫慶新 吳佳迪
陳靜雲 郭昭男 簡淑慧 邱毓斌 石德隆
朱傳炳 政大書城 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本期精采圖像提供

崔媽媽服務中心 工傷協會 古巴後援會台北分會

亞洲勞動快訊之友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參與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隨時提供最新訊息及深度內幕 <input type="checkbox"/> 提供曝光度高的寄售點 <input type="checkbox"/> 邀約快訊社編輯群加入你們的餐會 <input type="checkbox"/> 與快訊社編輯群做深度接觸 <input type="checkbox"/> 做愛做的事...其他...		

如果您對本期內容有任何建議,請告訴我們.....

我們的通訊地址: 北市木柵郵政 1-624 號信箱

E-mail: g6262005@grad.cc.nccu.edu.tw

訂閱劃撥帳號: 19266756 戶名: 鄭怡雯

@sia

L@bour

Upd@te

亞洲 勞動快訊

雙月刊

每逢單月二十日出刊

3